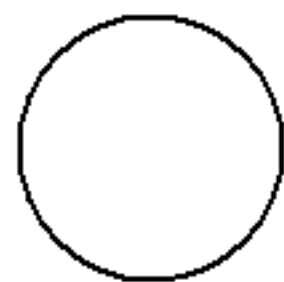


红旗

HONGQI



一九六二年 8·9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二年第八、九期 ★

目 录

危机四伏的美国经济 孟用潜 (1)

鲍威先生的责难和美国国务院的苦恼 张振亚 (20)

肯尼迪与产业后备军 陈 原 (23)

论考茨基主义 理 夫 李思温 王福如 (28)

充分地发挥技术人员的力量 石克俭 (42)

数理逻辑和形式逻辑 王宪钧 (46)

草原上的拓荒者 乌兰巴干 (53)

漫画：遗产税 江 帆 (27)

★ 四月二十五日出版 ★



危机四伏的美国经济

孟用潜

今年一至三月，肯尼迪向美国国会連續提出国情、預算、經濟、貿易、农业、对外“援助”、国际收支等一系列咨文和报告，大談其对内对外的施政方針。关于美国的經濟情况，他說他为一九六一年規定的扭轉經濟下降趋势的目标已經实现，“在国内年初时我們陷于經濟衰退的深谷，年終时我們走上了复苏和經濟增长的康庄大道”。他并且說，只要美国国会批准这些咨文，通过他所提出的法案，并且給“总统以随时备用的权力”，就可以“防止未来的衰退”，“取得全面和持久的繁荣”。

应该指出，以肯尼迪为代表的美国反动統治集团，事实上是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和危机四伏的趋势，在国内如此，在国外也是如此；肯尼迪在上述咨文中所提出的都是加深和加剧美国国内外矛盾的反动的政策措施。对于肯尼迪的咨文，可以从各个不同方面进行分析。本文拟从战后美国經濟发展的基本趋势，特別是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的危机和危机以后的形势，对美国壟断資本目前所处的困境和肯尼迪政策的实质，作一个初步的考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經发生过五次經濟危机。經濟危机連續不断地发生，表明美国經濟經常处于很不稳定的状态。最近的一次危机，是从一九六〇年一月工业生产指数达到一一一（以一九五七年为一百）以后开始的。一九六一年二月生产下降到一〇二，三月生产开始回升。肯尼迪上台，恰好赶上經濟回升，因此，不能說是由他“扭轉”了經濟下降的趋势。一九六一年七月，生产回升到一一二，即恢复到危机前的最高点。到去年十二月，工业生产指数仅增加到一一五，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經濟并没有出現像肯尼迪在国情咨文中所預言的“繁荣”，而是陷于踏步不前的停滞状态，甚至美国官方最近对今年的經濟前景也已經感觉有些暗淡了。

一九六一年美国生产回升的特点是，生产資料的生产，就全年来說，还没有超过一九六〇年的水平，其中最重要的工业設備甚至还只是停留在一九五七年的水平；超过一九五七年水平的只是商业設備的生产。具体情况如下（以一九五七年为一百）：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二年第八、九期 ★

目 录

危机四伏的美国经济 孟用潜 (1)

鲍威先生的责难和美国国务院的苦惱 ... 張振亚 (20)

肯尼迪与产业后备軍 陈 原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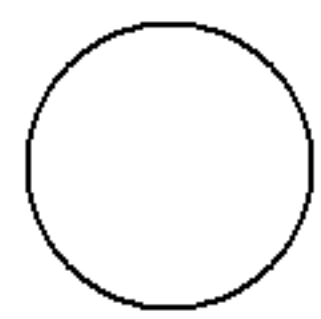
論考茨基主义 理 夫 李恩瀛 王福如 (28)

充分地发挥技术人员的力量 石克儉 (42)

数理邏輯和形式邏輯 王宪鈞 (46)

草原上的拓荒者 烏兰巴干 (53)

漫画: 遗产稅 江 帆 (27)



☆ 四月二十五日出版 ☆



两个方面，一是失业日益严重，二是壟断資本集中的趋势有新的发展。

根据美国官方統計，去年二月失业人数是五百七十一万人，失业比率（即失业人数占劳动力总人数的百分比）是百分之六点九；十二月失业人数减少到四百零九万人，失业比率减为百分之六。全国十二个大城市中，黑人工人失业的比率则高达平均失业比率的三倍。今年三月份，失业人数增加到四百四十万人。从战后历次經濟危机之后的情况来看，失业的比率有不断增长的趋势。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危机之前，失业比率不到百分之三，危机之后增加到百分之四，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危机之后又增加到百分之五，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危机之后則增加到百分之六。每次危机之后，失业比率不是降低，而是增加，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

根据官方統計，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危机期間，美国一百五十个工业中心有八十九个被划为严重失业区或蕭条区*。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危机期間則有一百零一个工业中心被划为蕭条区，其中七十一个区的失业比率为百分之六至九，十七个区为百分之九至十二，十三个区为百分之十二以上，有的則在百分之二十以上。就是到今年一月，工业生产已經恢复到危机前生产最高点之后，仍然有六十一个区是蕭条区。由此可見，美国的工业中心正在一个一个地烂下去，失业已經成为长期无法解决的問題。

其实，美国官方的統計还远不能說明失业情况的严重。他們在編制失业統計的时

候，經常弄虛作假，方法之一是一方面把劳动力总人数扩大，另一方面又把失业人数压小，这样一加、一减、一除，就把失业比率显著地縮小了。那么，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呢？美国資产階級劳工經濟专家、参議員道格拉斯认为，在劳动力总人数的統計中，約有一千一百万小业主和不受工資报酬的家庭劳动者不应計算在內。这样，劳动力总人数就不应当是七千一百万人，而应当是六千万人。他还认为，在失业人数的計算上，除全失业外，应把半失业折成全失业（約一百二十五万至一百五十万人）一并計算在內。按照道格拉斯的算法，失业比率不是官方所說的百分之六，而是百分之十以上。美国进步經濟学家佩洛在一月份的《政治月刊》上又作过一次計算。他认为，有相当大量的失业工人，由于长期失业已經絕望而不再登記找工作，官方就认为不符合失业定义，不再列入官方的失业統計。如若把这些以及其他未列入統計的失业工人計算在內，失业比率就不是百分之十，而应当是百分之十四，差不多七个工人中就有一人失业。

在美国，半失业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根据美国劳工部統計，一九五七年半失业工人是一千一百六十万人，一九五八年增加到

- * 严重失业区或蕭条区，即凡失业人数达到当地劳动力总人数百分之六，而且失业人数在四年中連續有三年超过全国平均失业率百分之五十，或在三年中連續有两年超过平均失业率百分之七十五，或在两年中有一年失业人数超过平均失业率一倍以上的地区即划为严重失业区。



一千四百一十万人，一九五九年會减少到一千二百二十万人，但据佩洛估計，一九六一年可能已經超过一千五百万人。

美国在历次危机之后，失业比率不断增高，就业比率則不断下降，而且下降得相当严重。美国进步刊物《經濟札記》最近根据官方出版的《劳工月报》，对于战后几次經濟危机生产下降到最低点的十一个月以后的就业增长情况，作了一次比較，如下表：

危机后就业增长百分比

(生产下降到最低点的十一个月之后)

	1950	1955	1959	1962
	9月	7月	3月	1月
非农业就业	8.1	4.5	3.8	1.8
其中：				
制造业	13.1	5.8	5.3	3.1
耐用品	22.3	8.1	7.4	4.8
非耐用品	4.0	3.0	2.8	0.9
建筑、运输、矿业	13.3	5.1	2.8	-3.0
貿易	3.1	3.4	2.6	0.9
金融、服务业	2.8	4.4	3.5	2.1

从上表可以看出美国非农业的就业增长从一九五〇年的百分之八点一逐次下降到一九六二年的百分之一点八，在制造业的耐用品生产部門就业的增长率則从百分之二十二点三下降到百分之四点八，在建筑、运输和矿业部門到今年則不仅沒有增加，而是在絕對地减少。

由于长期农业生产过剩的危机，大批的农場不断破产或者被兼并，也加剧了失业的严重程度。根据美国官方統計，从一九五四

到一九五九年，美国农場由四百七十八万个减少到三百七十万个，五年之間共减少一百零八万个。其中有二十三万个，根据官方解釋是由于农場“定义”的改变不再列入农場統計之內。即使把这二十三万个扣除，五年之間也减少了八十五万个，即每年减少十七万个，每天减少四百六十六个，每小时减少二十个，每三分钟减少一个。同时美国农业人口也在不断下降，一九五〇年是二千五百零五万人，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六点六，一九六〇年下降到二千零五十四万人，仅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一点四。农民和农业工人大批流亡到城市，变成城市的产业后备軍。

失业和半失业日益严重，表明美国工人阶级相对以至絕對贫困化的趋势都是在日益加深。这也正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的，资本主义积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所必然产生的后果。因此，我們必須考察一下美国壟断資本主义的积累問題。

美国壟断資本积累的增长是十分显著的。美国公司納稅前的利潤，在一九五三年是三百八十三亿美元，一九六一年增长到四百六十一亿美元。固定資本投資在一九五三年是二百八十三亿美元，一九六一年增长到三百四十四亿美元。除去固定資本之外，美国公司流动資金的淨額也在不断增加，一九五三年是九百一十八亿美元，一九六一年上半年已增加到一千三百七十九亿美元。尽管在这期間，連續发生过三次經濟危机，但是，由于美国壟断資本把在危机中遭到的损失，



首先而且主要地是轉嫁給美国工人階級，因而資本积累还是不断增长。

馬克思曾經指出，竞争和信用是資本集中的两个最有力的杠杆。美国壟断資本由于这两个杠杆的作用一向就十分集中。近年来，集中的趋势則更加加劇。根据美国联邦貿易委员会的材料，从战后到現在，美国的企业已經发生过三次合并的浪潮。第一次是在一九四六年，那次制造业的合并有四百多起。第二次是在一九五五年前后，每年合并五百多起。最近这次合并浪潮从一九五九年开始，連續三年，年达六百余起。在一百家最大的制造业公司（年銷貨額从将近四亿到一百二十七亿美元的公司）中，有六十多家至少进行过一次大合并。一九六一年的合并，如果把工业以外的其他行业也包括在內，共計一千二百三十四起；其中工矿企业的合并六百七十一起。

企业合并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导弹、电子、石油、化学、建筑、铁路、航空、造船以及家庭用具、化妆品、食品、飲料等各种工业部門，也包括拥有几百家以至两千家商店的联銷商店，还包括掌握金融命脉的大銀行的合并。企业的合并，有的是在同一部門的同一行业或不同行业之內进行，有的是在不同部門的企业之間进行。在同一部門由于竞争激烈，有两个以上的大公司一經合并，其他公司也便相率效尤，跟着实行合并，否則就会使自己在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这种竞争和合并，在一些已經进入衰落

阶段的部門显得特別严重。最近美国最大的两个铁路公司，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和紐約中央铁路公司，正在进行合并。这两个公司的貨运量占全国铁路貨运量的百分之十八，雇佣工人十二万，占全国铁路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十六。铁路运输在美国是一个日趋衰落的部門。从一九五三年以来，铁路工人减少四十五万人，現在还有七十五万人。美国铁路办事員工会主席、肯尼迪的劳資顧問委员会委員哈里森估計，铁路方面已經提出的一系列合并計劃一旦实现，还会有二十万铁路工人要失业。这种情况表明，衰落部門的大規模合并对于工人階級的打击特別严重。

在不同部門之間的合并和兼并，主要是因为有些部門之內生产和市場的矛盾已經极端尖锐，因而就需要另寻出路，通过合并或兼并把資本轉移到新兴的、有大利可图的特别是与軍事生产有关的部門。美国壟断資本爭夺軍事訂貨，对于这种超部門的合并起着推波助瀾的作用，特别是由于按武器系統承包現在已經成为大壟断集团爭夺軍事訂貨的重要方式。举例來說，美国一瑪利艾塔公司是一个大建筑材料公司，去年二月合并了两个建筑公司之后，八月又被在五角大樓的軍事訂貨中占第六位的馬丁公司所合并，成为馬丁一瑪利艾塔公司。这样它就可以按照武器系統从导弹的設計、发展、生产到发射基地，一攬子承包下来。不久以前福特汽車公司兼并从事电子工业生产的腓尔科公司，显然也是为了爭夺軍事訂貨。这一类的合并今后还会繼續发生。



这些年来，銀行也在大量地合并。从一九五二到一九六一年被合并或兼并的銀行有一千五百三十家。最近两三年，摩根財团的摩根公司和保证信托公司合并，洛克菲勒財团的大通銀行和哈姆斯塔德銀行合并，以及化学銀行和紐約信托公司合并、制造商銀行和哈諾佛銀行合并等，表明美国各大財团之間在金融战綫上的斗争相当激烈。

資本的急剧集中不能不引起中小企业的大量破产。一九四七年美国倒閉的企业有三千五百家，一九六〇年有一万五千四百四十五家，一九六一年有一万七千零七十五家（今年一月份繼續倒閉一千四百四十七家，比去年十二月份增加百分之十三）。一九六一年是二十八年以来企业倒閉最多的一年，倒閉企业的負債約十一亿美元，相当于一九五五年的二点四倍，一九四八年的四点六倍。中小企业的大量破产，也是造成工人大量失业的原因之一。

經過合并之后，資本更加集中，竞争更加激烈，生产設备就更需要現代化和自动化。据美国劳工部估計，按照目前生产設备現代化和自动化的規模和速度，每年大約有一百八十万在业职工要被机器所代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失业情况就将更为严重。

企业大規模合并和資本大量集中，实际还可能引起更深刻的变化。美国《商业周刊》最近有一篇文章談到在美国經济发展的历史上有过三次大的合并浪潮：第一次是一八九八到一九〇二年，第二次是一九二六到一九三〇年，第三次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到现在。这篇文章把一九六一年看做是战后合并浪潮的最高峰。合并的浪潮是否已到頂峰，目前尚难断定。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的合并浪潮同經济危机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一个浪潮之后，在一九〇三年和一九〇七年爆发了經济危机。在第二个浪潮中，經過更大規模的合并与集中，爆发了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严重的經济危机。从战后到现在，美国还没有爆发过像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那样严重的危机，但是許多迹象表明，美国經济正在向着那个方向发展，壟断資本竞争的加剧和企业大規模合并的浪潮，就是在为一次空前严重的危机准备条件。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在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方面，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危机在美国国内所引起的变化是十分深刻的。它加深了美国工人阶级和壟断资产阶级之間的矛盾，加深了壟断資本集团之間的矛盾，导致中小企业的大量破产，在經济方面所带来的后果異常严重。

（三）周期縮短是战后美国經济危机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根据美国资产阶级經济学家自己的計算，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危机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危机相隔四十五个月，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危机与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危机相隔三十五个月，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危机与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危机相隔仅二十五个月。同时，每次危机之后，生产回升超过危机前生产最高点的幅度也在逐次减低。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危机之后生产增长百分



之三十四，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危机之后生产增长百分之十，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危机之后生产仅增长百分之八。这些情况表明，目前美国经济是处在严重动荡不定的状态。

事实上，美国有些重要生产部门显然已经进入衰落阶段。钢的最高产量是一九五五年的一亿零六百万吨(公吨，下同)，现在已经下降到八千五百万至九千万吨，而炼钢的设备能力则高达一亿四千二百万吨。汽车的最高产量是一九五五年的七百九十二万辆，现在已经下降到五百五十四万辆，而汽车的生产设备能力则高达一千万辆以上。煤的最高产量是一九四七年的六亿二千万吨，现在已经下降到三亿五千九百万吨。其他如铁路运输、纺织、家庭电气用具等部门也早已进入衰落阶段。美国许多萧条区之所以萧条，原因之一是那里的主要工业就是属于上述进入衰落阶段的工业部门。美国目前也还有少数工业部门在发展，例如电机制造、电力、工业化学等部门，现在比一九五七年分别增长了百分之十四、百分之三十一和百分之三十七。但是仅仅依靠这些部门生产的增长，并不足以扭转美国经济走下坡路的基本趋势。

(四) 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是在显著下降。从工业生产和出口贸易增长的速度来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一九五三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了如下的变化：

	工业生产增长	出口贸易增长	
		出口值	出口量
美国	20%	33%	19%
英国	28%	45%	32%
西德	91%	189%	169%
法国	84%	91%	104%
意大利	100%	178%	237%
日本	217%	232%	246%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占比重，从战前、战后初期到最近发生变化如下：

	1938	1948	1961
美国	37.0%	53.4%	43.3%
英国	13.7%	11.2%	9.0%
西德	—	3.6%	9.0%
法国	5.5%	3.9%	5.0%
意大利	3.3%	2.6%	4.1%
日本	3.6%	1.0%	4.8%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从战前、战后初期到最近发生变化如下：

	1937	1947	1961
美国	14.2%	32.5%	17.7%
英国	11.2%	9.8%	9.1%
西德	—	0.5%	10.7%
法国	4.1%	4.0%	6.1%
意大利	2.4%	1.4%	3.5%
日本	5.1%	0.4%	3.6%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品出口方面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西德所占比重在一九六一年第一次赶上了美国，具体情况如下：



	1937	1950	1961
美国	19.6%	27.3%	20.3%
英国	22.4%	25.5%	15.9%
西德	—	7.3%	20.3%
法国	6.4%	9.9%	9.6%
日本	7.2%	3.4%	6.8%

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表明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正在遭遇着严重的竞争，而且处在日益不利的地位。

但是从资本输出来说，美国仍然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根据美国官方统计，美国私人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在一九五〇年约为一百二十亿美元，一九六一年增加到三百五十亿美元。美国报刊自己估计，由于隐瞒不报的情况相当严重以及资产的账面价值远低于实际价值，实际的对外投资可能比官方的统计多一倍。美国通过对外投资在海外直接占领的市场，实际早已超过商品出口所占领的市场。今后美国垄断资本还会继续增加资本输出，扩大它在海外的阵地。但是由于竞争者的增加，市场是在相对地缩小，有些重要工业部门的市场甚至在绝对地缩小。这种竞争的发展，将使生产和市场的矛盾在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日益尖锐。

最后还要指出，在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危机期间爆发的美元危机，是美国国际地位削弱的一个重要标志。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纽约一直是国际金融的中心，美元一直是资本主义世界占统治地位的货币。这是美国金融帝国称霸世界的一个重要工具。美国是个贸易出超的国家，但是由于资本的

大量输出和海外军事开支的不断增长，近年来国际收支出现了严重的逆差。从一九五八到一九六〇年，每年平均逆差达三十七亿美元。国际收支逆差的出现，促使美国的黄金不断外流，黄金储备显著减少。美元发生了危机，法郎、马克、英镑实行自由兑换，美元不再是资本主义世界唯一占统治地位的货币。从国际短期资金的流动来看，美国的债权到去年年底截止是四十七亿一千万美元，债务则高达二百二十五亿六千万美元。美国黄金储备已经下降到一百六十九亿四千七百万美元（今年三月底下降到一百六十六亿一千万美元，是一九三九年八月以来最低的黄金储备），再扣除联邦储备银行为保证银行券发行和活期存款所必需的法定百分之二十五的准备金一百一十八亿美元，可见国际金融中心的美在短期资金往来上，实际已经陷入入不抵债的地位。继美元危机之后，一九六一年又发生英镑危机，马克和法郎的地位相对增强。于是在国际货币和金融战线上，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美元危机不仅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地位，同时还加深了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

二

如上所述，从美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来看，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危机给美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各方面的矛盾正在日益加深。但是为了说明美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对于美国国内外的矛盾还需要作进一步的



分析。

从生产和市场的矛盾来说，当前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国内市场还有没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应该说这种可能很小。就消费品市场来说，战后十几年来美国垄断资本的确用尽心机，采取了不少措施来刺激国内市场。它们一方面利用新技术制造了许多种类的新产品，利用汽车和其他耐用消费品每年在形式上的花样翻新，利用大量的五花八门的广告（广告费年达一百二十亿美元）等各种办法来刺激消费。另一方面还利用与年俱增的消费者信贷和房屋抵押贷款来“扩大”国内消费市场，其实这是“寅吃卯粮”预支购买力的措施。现在消费者信贷已经从一九四五年的五十六亿美元增长到五百七十一亿美元，房地产抵押贷款从三百五十五亿美元增长到二千一百九十三亿美元。广大消费者负债累累，实际上变成高利贷款的奴隶。因此，依靠这类贷款来“扩大”国内消费市场的可能性越来越少。那么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固定资本投资的新高涨，来扩大第一部类，即生产资料的国内市场呢？这种可能也很小。从战后美国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的趋势来看，以一九五四年价格计算，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七年各投资三百二十亿美元，是战后的最高水平，从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一年平均每年投资仅二百七十亿美元。由于生产设备能力严重过剩，目前很难出现一次投资的新高涨，因而扩大第一部类商品市场的可能性也在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垄断资本就更加需

要利用国家机器，采取各种措施为垄断资本企业服务。在这些措施中，最主要的是更多地通过国家预算，增加政府财政开支。增加的财政开支主要是用于增加军事订货，同时也用于修建公共工程、收购和出口剩余农产品等等。依靠国家财政加紧军事生产，对于垄断资本来说，这种办法有很大的好处，因为订单特别大，战略原料可以由国家代为囤购，资本可以由国家财政垫支，产品可以通过财政开支实现，甚至大量的研究费用也可以由国家开支。这是美国垄断资本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最廉价的手段。美国垄断资本必须加倍地利用国家机器，更多地依靠国家各种财政措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当垄断资本自身无能为力的时候，它必然要乞灵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财政措施是美国统治集团所一贯采取的防止“经济衰退”的手段，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就曾经采取过这种办法。在那个时期，艾森豪威尔还不断吹嘘美国经济的“内在稳定器”的作用，强调通过货币、金融措施来“调节”经济，就是用提高和降低利率、抽紧和放松银根的一套办法，对经济进行所谓“调节”。但是，这些措施并不足以防止经济“衰退”，在他当政的八年，美国连续发生了三次经济危机。肯尼迪上台以后，更加突出地强调采取财政措施。在今年的经济咨文中，他提出为了“加强对付衰退的防御措施”，主要的是加强“财政系统”、“赋税系统”和增加“总统的备用权力”。因此，肯尼迪最近就提出了高达九百二十五亿美元的预算开支，高达九



百九十三亿美元的承担义务权和高达一千一百四十八亿美元的现金预算开支。*

肯尼迪提出的预算是美国战后最大的预算，比一九五三年侵朝战争时期的预算还高出一百八十四亿美元。肯尼迪的预算咨文说，在美国联邦政府的九百二十五亿美元的预算开支中，“几乎有五分之四是与我们目前国家安全和过去的战争有关的费用。用于国防、国际和空间计划方面的开支估计为五百八十一亿美元（占百分之六十三）；用于与过去的战争有关的退伍军福利费和利息预计总数为一百四十七亿美元（占百分之十六）。所有其他开支估计为一百九十七亿美元，占总数的五分之一。”肯尼迪本人不仅公开承认和宣扬预算的五分之四是与战争有关的费用，而且在预算中把美国国务院“国际活动”的全部经费公然列入间接军事开支。这个预算是根据美国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所决定的一个军事预算。预算的目的性是这样明显，美国参加日内瓦十七国裁军会议到底有多少“诚意”，也就可想而知了。

美国能不能在这样大规模扩军备战的基础上达到肯尼迪所说的“全面和持久的经济繁荣”呢？这是需要具体分析的问题。

从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三年，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空前地发展了它的军事生产。四年之间，直接军事开支从十三亿美元猛增到八百一十九亿美元，工业生产增加了一点二倍。大战结束后，由于军事生产下降，工业生产也随之下落。侵朝战争爆发，再度大规模发展军事生产，工业生产总指数又有较大的回升，到一九五二年才

恢复到战时一九四三年的水平。这说明，军事生产的增长确实超过增加美国工业生产的作用。

但是军事生产发展到现在，它作为促进生产上升的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军事生产现在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那样是一个临时发生作用的因素，而是一个经常性的因素，因而它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已经大大减弱。把已经成为经常的直接军事开支，从一九六一财政年度的四百七十五亿美元，增加到一九六三财政年度的五百二十七亿美元，即增加五十二亿美元，与大战初期把军费猛增八百零六亿美元，是不能等量齐观的，它们在经济上所能发生的作用，显然有很大的差别。第二，军事生产本身的条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侵朝战争，在军事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常规武器，侵朝战争以后是飞机和导弹，最近则是核武器和导弹等。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在这期间，与军事生产直接有关的工业部门也先后发生了和发生着重大的变化。首先获得重大发展的是钢铁工业、汽车（坦克）工业，这两个部门以后衰落了。继钢铁和汽车之后获得重大发展的是飞机工业，这个部门以后也开始衰落了。继飞机之后，获得重大发展的是电机、电子、化学工业，现在这些部门的生产设备能力也相当严重地过剩了。因

* 根据美国预算程序的规定，预算开支是政府向国会提出的开支估计，承担义务权是政府向国会提出的拨款等要求，现金预算则除一般预算外，还包括失业救济、老年救济、公路等基金的收支。



此，从总的方面看，由于军事技术不断向尖端发展，军事生产所直接影响的工业的范围在缩小。在尖端武器的生产中，技术的性能和精密的程度大为提高，生产所需要的工时大为增加，而所需用的原材料则实际是在减少，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对于钢、铝等许多基本工业部门所能发生的刺激作用。另一方面，尽管军事开支不断增加，但各种武器的订货价格也不断提高。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B-17轰炸机是二十多万美元一架，现在的B-70轰炸机则为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美元。潜艇原来是五百万美元一艘，现在原子潜艇是四千五百万美元，装设北极星导弹的潜艇则要九千万美元。阿特拉斯导弹也要三千五百万美元一枚。军事工业的物质生产并不是与军费的增加而相应按比例地增加。第三，从一九三九年到现在，二十四年来长期的、片面的经济军事化，实际是美国许多工业部门陷于停滞以至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庞大的财政开支和大规模扩军备战，只能是替美国垄断资本集团打强心针，并不能给美国经济带来什么全面和持久的繁荣，相反地会使经济的畸形发展更为严重。

肯尼迪最近提出的预算比艾森豪威尔一九六一财政年度预算实绩，在开支方面增加了一百一十亿美元，在收入方面增加了一百五十三亿美元，而预算收入的绝大部分是来自劳动人民的税收。这就是说，庞大的军事预算最后要完全由美国人民来承担。这是“苛政猛于虎”的、吃人的财政。肯尼迪预算收入增加的主要根据，是预测从现在到明年六月

美国会出现一片繁荣景象。这种指望一旦落空(显然要落空)，庞大的预算开支就会带来财政赤字。本年度的现金预算赤字，据美国官方估计将达八十五亿美元，下年度财政发生赤字也势所难免。为了弥补赤字，就需要发行公债。截至今年二月，美国联邦政府负债已达二千九百七十四亿美元，公债发行限额原定为一千八百五十亿美元，不久以前暂时提高到二千九百八十亿美元。最近，美国国会已经批准肯尼迪的要求，把国债的原定限额增加到三千亿美元。财政赤字的不断出现，已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财政开支的增长。因此，增加政府开支这条路子实际也是越走越窄。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会不会发生通货膨胀呢？肯尼迪的经济咨文说：“一方面是发生通货膨胀，而另一方面是陷入经济衰退，灵活的和保持警惕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将使我们能够保持狭隘的中间的道路。”这里必须指出，美国的通货在战后一直是处在慢性膨胀的过程中，物价也不断上涨，但膨胀更主要的表现是信用膨胀。美国的信用膨胀，无论在国家财政上(特别在公债发行上)、在工商业贷款上、在证券市场投机上、在消费者信贷和房屋抵押贷款上、在国际财政金融上，都是十分严重的。美国垄断资本一向把信用膨胀作为招财进宝的一张王牌。但事物总是向反面转化，由于信用过度膨胀，现在实际正在孕育着一次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

根据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美国生产和市场的矛盾十分尖锐，无论扩大消费资料或生产资料市场的可能性都很小，增加军事开



支作为刺激生产的作用也甚为有限。肯尼迪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是变本加厉的經濟軍事化的措施，这些措施不是在緩和而是在扩大和加深这种矛盾，酝酿着一次新的更严重的經濟危机。

三

美国壟断資本在国内找不到出路，就必然要加紧对外扩张。但是，由于主要資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对比，已經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不能不在帝国主义陣营内部引起激烈的斗争。这一斗争在商品輸出、資本輸出、国际货币金融等各个战线上同时展开，斗争的場所目前主要集中在西欧。

战后西欧的經濟是在美帝国主义扶持下恢复和发展起来的。但是发展到現在，西欧在資本主义世界已經成为与美国竞争的勁敌。一九六一年西欧的鋼产量共計一亿零七百七十六万吨，已經超过了美国。就工业生产中最关键的工作母机的生产來說，西欧也已經超过美国；工作母机的出口則超过美国将近四倍。具体情况如下：

工作母机的生产和出口

	生产比重	出口吨数 (单位：万吨)
美国	38%	4.69
西德	27%	12.36
英国	13%	3.94
法国	8%	1.57
西欧其他国家	—	5.00

另一个重要事实是，西欧在資本主义世界的进口貿易中占百分之四十七，美国仅占

百分之十三；西欧在出口貿易中占百分之四十四，美国仅占百分之十八。在資本主义世界工业品出口方面，如前所述，西德在一九六一年已經赶上美国。这几个重要事实可以說明，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市場。就資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來說，西欧是联結和控制亚非地区的一个重要樞紐。西欧对于社会主义陣营則是帝国主义实行战略包围的前沿陣地。因此，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对西欧是势在必爭。

主要資本主义国家圍繞着西欧的斗争从一九五七年簽訂羅馬条約、一九五八年成立共同市場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西欧六国(西德、法、意、荷、比、卢)之間逐年降低关税，对外逐步实行統一关税，实行货币自由兌換，取消对資本流动的限制，規定到其他国家設厂投資的自由权利，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并且企图把六国工人的工資待遇向下拉平。这一切都是为西欧壟断集团服务的措施。几年来这些措施为壟断資本扩大了商品市場，扩大了投資的势力范围，而且扩大了劳动力市場，为进一步榨取西欧工人阶级創造了条件，对于一九五七年以后西欧工业生产起了推动作用。

在主要資本主义国家之間，这场斗争首先是在以西德和法国为轴心的六国和以英国为首的七国(英、挪、瑞典、丹、奥、瑞士、葡)，即共同市場和小自由貿易区之間展开的。形势的发展显然是有利于西德和法国，而不利英国。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一年，就工业生产、进口和出口貿易量的增长來說，“六国”都大大超过“七国”，如下表：



西欧工业生产和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工业生产增长	进口增长	出口增长
六国	30%	48%	49%
七国	14%	27%	16%

在“六国”“七国”的斗争中，共同市场压倒了小自由贸易区，最后迫使英国在去年八月正式申请加入共同市场。这一斗争还正在继续进行。目前的形势仍然有利于以西德、法国为轴心的共同市场。

美国在这场斗争中，最初企图分而治之，坐收渔翁之利。但是，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特别是美元危机，显著地削弱了美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华尔街作为世界金融的中心，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开始发生动摇。美国不仅已经失去战后初期对西欧的绝对优势，现在连相对优势也在发生变化。这就是肯尼迪在国情咨文中为什么大喊大叫西欧的发展是对美国“最大的挑战”的原因。

为了继续控制西欧，为了解脱自己的经济困境，美国统治集团正在极力争夺西欧的市场，扩大出口。肯尼迪向国会提出的“扩大贸易法”，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认为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很可能在今后的一代或几代的时期里影响西方的团结、冷战的进程和我国的发展”。可见事关重大，因为这表明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将进一步激化。

要扩大出口，美国面对着一个重要事实是西欧的关税壁垒已经建成。要突破这个壁垒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这不仅直接关系到美国本身，而且影响到在美国势力范围内的加拿大、拉丁美洲和日本工业品以及农

产品对西欧的出口。肯尼迪企图“通过谈判降低共同市场对外的关税壁垒”，并且要求国会“授予总的权力，以便在互惠谈判中把现有关税降低百分之五十”，以至完全免除“美国和西欧经济集团共占世界贸易百分之八十以上那些类产品的关税”。这就是要冲破西欧的关税保护，开放西欧市场，因而直接威胁到西欧垄断资本的利益；另一方面，既然必须有所互惠，美国垄断资本也就会被迫作一定程度的让步，容许西欧扩大对美国的出口，这又会直接威胁到美国一部分工商业的利益，并会减少工人就业的机会，而且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加拿大、拉丁美洲和日本。因此，围绕西欧共同市场的斗争，实际是国际垄断资本争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斗争。

这一斗争的发展决定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前景的变化。美国国会对外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席赫斯曾经做过这样一种估计，他说，只要西欧共同市场的经济还继续发展，还有很大的出口顺差，在谈判中它可能做一定程度的让步；但是如若它的经济陷于停滞，谈判的整个前景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的问题是，西欧生产高涨的阶段已经过去，有些国家已经陷于停滞，有些国家的生产增长速度已经显著降低，经济危机的阴影正在笼罩着西欧。在这种情况下，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将更加尖锐，美国垄断资本扩大出口贸易的前景也会更加暗淡。

美国出口不能增加，国际收支逆差就会进一步恶化，国际货币和金融战线上的斗争也会随之激化。美国一九六一年国际收支逆差，如果不包括外国偿还的借款，按年率



計算，第一季是十四亿美元，第二季二十三亿美元，第三季二十八亿美元，第四季三十九亿美元，发展趋势是逆差逐季增加。如果包括外国偿还的債款，則全年实际逆差二十五亿美元，比一九六〇年减少了十五亿美元。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貿易出超稍有增长，另一方面而且更主要的是向主要資本主义国家催討了欠債。如若去年沒有討回将近七亿美元的还款，逆差会更为严重。当美国必須靠“催討租稅銀子”来解决国际收支逆差問題的时候，情况显然是并不太妙了。

肯尼迪最近在国际收支报告中指出，从一九五三到一九六〇年美国制成品輸出价格比其他工业国家多上漲了百分之十四。这就使美国在出口竞争上处于愈益不利的地位，因而依靠扩大商品輸出来解决国际收支逆差的可能性很小。于是他提出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跟我們的某些盟国談判，設法增加它們向美国购买的軍事装备和劳务的数额”。肯尼迪在这个报告中是把最现代化的軍事装备輸出做为“解决我們的国际收支逆差办法中的第一道防綫”的第一条办法提出的，情况的严重也就可想而知了。

国际收支逆差之所以关系重大，是因为它在动搖着美国壟断寡头統治資本主义世界的金融支柱。美国在国际金融方面的另一个重要弱点是短期債務負債过多。各国政府和私人在美国存款和购买美国短期证券达一百八十八亿美元，其中各国政府占一百一十亿美元，私人占七十八亿美元。当美元在資本主义世界占統治地位的时期，这是国际金融中心財力雄厚的表现。現在美元的国际地位

根本动搖，負債过多便成为极大的負担，平时可以風平浪靜，一旦国际金融市場上有什么風吹草动，就有可能掀起一場金融風潮，資金大量外逃，黄金大量外流。而資金外逃，还不限于外国資本，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美国資本，美国資本家們自己对于美元也在失掉信心。

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一年資本主义世界两种主要貨幣，美元和英鎊相继发生危机。为了防止美元危机再度发生，美国力图通过和利用国际貨幣基金組織，支持它的国际金融地位。它几次提出方案，要有关国家出錢，增加国际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能力。从去年九月国际貨幣基金組織維也納會議，到十二月北大西洋公約国財政部長的巴黎會議，美国代表作了不少让步，提出不少諾言，共同市場国家最后才同意用备用貸款的形式，由十个国家筹措六十亿美元的备用貸款（美国二十亿美元，英国十亿美元，西欧共同市場五国二十四亿五千万美元，日本、加拿大、瑞典五亿五千万美元），另設一个对国际貨幣基金組織进行貸款的机构。由該机构的参加国貸款給国际貨幣基金組織，再轉貸給貨幣发生危机的参加国（实即美国或英国），作为临时解救美元或英鎊危机之用。但是貸款条件十分苛刻，遇有危机发生，是否貸款，貸款多少，須經十国审核，三分之二的参加国同意，而申請国（即美国或英国）无表决权，这实际上等于貸款須經共同市場国家审核批准。同时还規定，貸款到期須用放款国貨幣或黄金还款（按国际貨幣基金組織过去的規定，貸款須用美元或黄金偿还），这就是要美国黄金



出籠。另外还規定放款国遇有需要时,可以随时收回貸款,国际货币基金組織必須立即执行。西欧六国在巴黎財政部长會議上是儼然以債权国的身份向美国提条件,号称金融帝国的美国在會議上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些条件。这很可以說明美国今天在国际货币金融方面是处在如何困窘的地位。

美国壟断資本集团为了增强在西欧的競争地位,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越过共同市場的关税壁垒,增加在西欧的直接投資。单就制造业來說,美国在国外的厂房設備投資情况如下(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投資總額	对共同市場投資	对西欧其他国家投資
1959	1,147	214	236
1960	1,337	328	280
1961	1,755	504	398

美国最近几年对西欧的投資是逐年增长,一九六一年对西欧投資占全部对外投資的百分之五十一;其中对共同市場的投資比对西欧其他国家的投資增长更快。但是西欧的壟断資本已經羽毛丰满,美国無論单独投資設厂或与西欧資本合营,在談判条件上都遇到比过去更多的困难。因而从一九六一年在西欧的投資总数來說,九亿美元并不特別可观。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在主要資本主义国家之間,在經濟战綫的各个方面,美国正遇到西欧强烈的競争,这对于美国确实是一个“最大的挑战”。目前这种斗争比較突出地表现在經濟方面,对于美国对外擴張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困难。但是,西欧共同市場并不是一个純經濟組織,它是以西德、法国为軸心的西欧壟断資本組成的一个“超国家組織”。它有一

套常設机构,如六国委员会、六国部长會議、六国議會等等。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八日六国首腦會議决定,要使共同市場根据羅馬条約进一步实行政治統一,經常召开首腦例会交換意見,协调政策,以促进“欧洲的政治統一”,并且决定各常設委员会在最短期間提出实现統一的条約性质的建議。欧洲是統一不起来的,但是,共同市場的成立和发展,确实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陣营走向分裂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則竭尽全力維持它对西欧的控制。因此,在帝国主义陣营內就展开了一场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当然,美国統治集团和西欧主要資本主义国家还有互相勾結利用的一面,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同西德(以及日本)統治集团正紧密地勾結在一起,共同策划肯尼迪的所謂“本世紀的最大冒險事业”。在这方面,美帝国主义是西德侵略势力和法西斯势力的积极扶持者,西德則仍然是美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擴張的主要支柱。

四

美国壟断資本在西欧遇到了日益尖銳的競争,在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斗争日益高漲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它們能找到什么出路呢?

帝国主义掠夺原料出口国的办法之一是压低原料价格。从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一年底,資本主义世界原料出口价格平均下降百分之十二点六。按地区來說,拉丁美洲地区下降百分之十七,英镑区下降百分之十。在美国控制下的拉丁美洲下降最为严重。按具体商品來說,与一九五四年比較,咖啡下降百



分之五十七，可可下降百分之五十六，茶叶下降百分之三十七。与一九五一年比较，糖下降百分之五十一，小麦下降百分之十九，棉花下降百分之十五，橡胶下降百分之五十四。与一九五五年比较，铜下降百分之三十六。资本主义世界原料价格的下降，正在严重地影响着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原料出口，影响着这些地区许多国家的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原料出口国家的对外贸易，除少数石油出口国家之外，基本上都是入超，外汇极端困难，因而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十分贫乏。美国过剩的生产力面对着这个日趋缩小的市场，是找不到什么出路的。

美国对原料出口国家的贸易，拉丁美洲占第一位，亚洲第二位，非洲第三位。根据一九六〇年美国进出口统计，情况如下（单位：亿美元）：

	对美出口	对美进口
拉丁美洲	35.29	34.55
（委内瑞拉除外）	25.80	29.05
亚洲（日本除外）	15.72	22.91
非洲	5.35	7.60

在这三个地区，由于原料价格下降，受打击最重的是拉丁美洲。举例来说，拉丁美洲二十个国家有十一个国家出口咖啡。美国在一九五四年用十四亿八千六百万美元，进口二十二亿六千万磅咖啡，一九六〇年仅用十亿美元就进口了二十九亿磅咖啡。如若按一九五四年价格计算，美国在一九六〇年需要付出二十二亿九千九百万美元，这就是说，咖啡出口国的实际收入减少了十二亿九千五百万美元，即减少百分之五十六。美国进口咖啡

的绝大部分是来自拉丁美洲十一个国家。这十一个国家对美国出口一种商品，在一年之内就遭受到如此巨大的损失！美国从一九五五到一九六〇年，共进口咖啡一百六十八亿磅，按一九五四年价格计算，咖啡出口国共损失五十亿零五千万美元，其中拉丁美洲损失四十六亿美元，仅此一项，就远远超过肯尼迪提出的通过所谓“争取进步联盟”，在今后四年对拉丁美洲提供的三十亿美元“援助”。

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材料，到一九六〇年为止共计三百二十七亿美元，对加拿大和拉丁美洲投资一百九十五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百分之六十，西欧占第三位，亚洲占第四位，非洲占第六位。但是最近几年投资的情况有变化。从一九五七到一九六〇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共增加七十三亿五千万美元，对加拿大和西欧投资增加四十九亿美元，占百分之六十七，拉丁美洲第三位，亚洲第四位，非洲第六位；如果把美国对日本的投资除外，则非洲占第五位，亚洲占第六位。具体情况如下：

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单位：亿美元）

	1957年	1960年	1960年比1957年增加
投资总额	253.94	327.44	73.50
加拿大	87.69	111.98	24.29
西欧	41.51	66.45	24.94
拉丁美洲	74.34	83.65	9.31
亚洲	20.19	23.15	2.96
非洲	6.64	9.25	2.61
澳大利亚等	6.98	9.94	2.96
国际组织	10.41	14.18	3.77

美国对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投资没有显著增加，并不是由于它没有对这些地区扩大



資本輸出的野心，主要是害怕在這些地區投資不安全。儘管美國政府對於私人對外投資規定了許多保本的措施，儘管美國政府對外簽訂有關條約都有保證投資安全的明文規定，但是美國壟斷資本對於廣大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投資（個別國家除外）還是有些裹足不前。在這個時期，給美國壟斷資本打擊最大的是古巴。在美國對拉丁美洲的投資中，古巴占第二位，僅次於委內瑞拉。古巴革命政府把美國在古巴的投資全部收歸國有，這筆資產比美國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〇年對拉丁美洲其他十九個國家投資的總額還多。應當指出，民族民主運動的高漲實際也是阻止帝國主義資本輸出的堤防，它限制了壟斷資本，特別是美國壟斷資本發生作用的範圍。戰後這些年來，爭取民族獨立鬥爭在這方面所起的作用，應當給以足夠的估計。

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民主運動高漲的形勢下，肯尼迪政府裝作“同情”這些地區的革命的樣子，妄圖通過所謂“援助”的手段，來防止和撲滅這些地區的人民革命運動，並為美國壟斷資本擴大商品和資本輸出打開出路。肯尼迪最近提出一個四十九億美元的“對外援助”計劃，其目的據說是“要幫助世界上新興的和發展中的國家在政治獨立、經濟福利和社會正義方面得到發展”。關於美國的所謂“對外援助”，需要指出：（一）“對外援助”，包括軍事和所謂經濟“援助”，有百分之七十七首先用在美國，買美國貨，因此首先得到“援助”的是美國壟斷資本，“受援國”則是推銷美國商品的市場。（二）從一九五〇到一九六一年度在二百五十二億美

元的“軍事援助”中有一百五十八億美元，即百分之六十三，是用于北大西洋公約國家，有七十億美元，即百分之二十七，是用于蔣介石、朴正熙、吳庭艷之類的傀儡和另外一些參加軍事集團的亞洲仆從國家。由此可見，搞反動的侵略軍事集團是它“對外援助”的重點所在。（三）至於所謂“經濟援助”也主要是用于修建港口、碼頭、公路等軍事工程。此外，還有一些“經濟援助”，就像洛克菲勒給艾森豪威爾的信所說的，則是釣魚的“魚餌”。（四）“對外援助”是戰後美帝國主義對外擴張，爭奪霸權，奴役各國人民和鎮壓各國革命運動的工具。肯尼迪最近對於這種工具的作用又作了進一步的“發揮”。針對當前日益高漲的民族民主運動，他在“對外援助”的咨文中宣稱：“歷史已經使各國政府不再有和平革命和暴力革命之間的安全界線。現在再也沒有一段悠閑的間隔時間了”。因此，他提出對外“援助”要“把重點放在改進（受援國）國內保安部隊方面”，即放在對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鎮壓上，同時還要求撥款四億美元，來“對付這些急變和緊急事件”。肯尼迪非常擔心拉丁美洲、亞洲、非洲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高漲。他說，“如果這些國家垮台”（即這些國家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取得勝利），美國的“全部軍隊和原子彈合在一起也不会有什么用處”。他從這裡得到的結論是，為了美帝國主義的“安全”，在“對外援助”方面多花一些錢，同美國“支付的軍事開支比較起來是代價很小的”。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肯尼迪所謂“對外援助”的真實目的。

美國壟斷資本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



广大地区，正陷在日益加深的矛盾之中，而肯尼迪的一切反动措施都无法解决这些矛盾，相反地，是在促使这些矛盾进一步尖锐化。

五

肯尼迪一再强调必须加强美国经济的竞争性。他在经济咨文中说，“如果我们不能使我们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上具有竞争性，我们的出口运动就会失败”。对垄断资本来说，要使价格具有竞争性，就必须降低成本，也就必须一方面使生产设备现代化和自动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在目前特别重要的则是“冻结”工资工时、加紧对工人阶级的进攻。

美国垄断资本加紧对工人阶级的进攻，不能不激起工人阶级的强烈反抗。据美国官方统计，去年美国一共发生较大的所谓劳资争议（即工人罢工和资本家停工关厂）三千二百七十次，每月最少一百次，最多四百三十次，共损失工作日一千六百七十六万个。今年钢、铝、煤、建筑、飞机、造船、运输、电话等许多部门的劳资合同将要期满，或者需要重新谈判。任何一次谈判破裂都有引起罢工的

可能。今年一月已经爆发了纽约电气安装工人的罢工，他们经过一场激烈斗争，获得每周工作二十五小时的胜利。

美国统治集团认为，工人的斗争，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对他们的严重威胁。因此他们对于美国工人阶级，加紧实行露骨的高压政策。他们公开威胁要进一步修改塔夫脱—哈特莱反劳工法，完全剥夺工人的罢工权利。他们强制执行“麦卡伦法”和“史密斯法”，迫害美国共产党，是加紧实行法西斯化的一个严重步骤，是对美国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的猖狂进攻。与此同时，肯尼迪还在财政预算中拨款五千七百万美元，扩充联邦政府的监狱，实际是修建集中营。肯尼迪采取这些反动措施的目的是“防患于未然”，但结果必然会适得其反。

肯尼迪在咨文中大谈所谓美国的“福利”措施。但是拿危机期间工人在工资上所受的损失和他们所领到的失业救济与垄断资本家所榨取的纳税前利润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工资损失极为严重，失业救济甚为有限，垄断资本的利润却极为可观（见下表）。

危机期间工人失业的工资损失、失业救济和公司利润对比

经济危机年份	官方统计的全失业人数 (万人)	平均每人每周工资 (1美元)	全失业工资损失 (亿美元)	失业救济 (亿美元)	公司纳税前利润 (亿美元)
1953	190	70.47	70	9.6	383
1954	360	70.49	132	20.3	341
1957	294	81.59	125	17.7	432
1958	468	82.71	201	35.8	374
1960	393	89.72	183	27.3	450
1961	481	92.45	231	33.9*	461*
合 计			942	144.6	2441

• 估计数字



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一年期间的六个危机年份中，工人的工资损失高达九百四十二亿美元，而工人所得到的失业救济只有一百四十四亿美元，相差六倍半。在同一时期垄断资本集团所榨取的公司纳税前利润则高达二千四百四十一亿美元。这些损失和利润都是根据官方统计计算的，虽然不能反映事情的全部真相，但是可以看出，美国工人阶级创造的价值是巨大的，垄断资本榨取的剩余价值是大量的，在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危机不断发生，垄断资本在危机中转嫁给工人阶级的负担是异常严重的。肯尼迪用对失业工人的救济来宣传所谓美国的福利措施，其实这不过是美国垄断资本家企图软化美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一个大骗局。

肯尼迪在咨文中，还提到一项发放救济粮的所谓福利措施。他说从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到一九六一年十一月，领救济粮的人数就从三百七十七万人增加到六百二十万人（美国报纸报道为七百一十万人），情况的严重可见一斑。

在资本主义世界最富有的美国，每年领取救济金的约三千万人，占美国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由此可见，对于美国广大人民来说，所谓全民福利国家的“福利”，实际是贫民救济。马克思论述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的时候曾经指出：“工人阶级的求乞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办的贫民救济也就越多”。这真是一语道破。美国官办的社会救济越来越多，并不是由于美国出现了什么“全面持久的繁荣”，而是因为美国垄

断资本主义积累越来越多，产业后备军越来越大，劳动人民贫困化日益严重。

* * *

美国从战后到现在已经发生过五次经济危机（包括大战结束时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危机在内）。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危机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从那次危机开始，美国就转入一个衰落的过程。生产和市场的矛盾日益加深，阶级矛盾也随之日趋尖锐。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逐步下降，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不断扩大，美帝国主义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的国家和人民的矛盾也日益加深。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危机之后，各种矛盾是在进一步深化和激化。目前美国和西欧、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正在面临着一次新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虽然各国危机成熟的条件各有不同，但形势是越逼越紧。这在资本主义世界将引起深刻的变化。

面对着这种危机四伏的局势，肯尼迪最近提出的各项咨文表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在对内政策方面，正在加紧对美国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力量的进攻，加紧实行法西斯化；在对外政策方面，则加紧扩张，加紧侵略，积极扩军备战。这就是在美国号称自由派的肯尼迪的全部政策的实质。这样的政策不可能使美国垄断资本摆脱困境，也不可能挽救衰落中的美国经济；相反地，他们的日子将越来越不好过，困难将日益严重，今后的形势必将发生不利于他们的更多更大的变化。



鮑威先生的責難和 美国国务院的苦惱

· 張 振 亞 ·

今年三月九日，《紐約時報》发表了一封署名威廉·鮑威的讀者來信。信中这样写道：

“一月六日我給肯尼迪總統写了一封信，試圖使他認識門羅主义對我們……的生存是太重要了。决不能把它的執行權交托到拉丁美洲国家政客手中……如果美洲国家組織不采取必要步驟來清除古巴的菲德爾·卡斯特羅共产党政府，我們為了自己的国家安全就要執行門羅主义。”

这位投信人显然是沒有得到滿意的答复，因为他接着又写道：“一月三十日總統特別助理肯尼斯·奧唐尼爾給了我回信。他說，我的意見‘很正确’……但是，他又說，‘本政府認為本半球抵禦外來侵略的防務必須大家共同承擔’。”

写信者生氣地說：“我想問一問肯尼迪總統，不擁有軍事力量的美洲国家組織又怎能將外國列強驅逐出本半球……難道我們除了派軍隊去干涉古巴以外還能有其他辦法嗎？”

这位威廉·鮑威先生要肯尼迪不必去重視那些無足輕重的南鄰，他認為由美国直接派兵侵入古巴是刻不容緩的事。焦急之情，躍然紙上。這一切都表明，這是一位有着滿腦子帝国主义思想毒素的頑固人物。

不過，值得指出的是，他的愚蠢也同樣十分驚人。他竟当真相信肯尼迪已把所謂

“門羅主义”的執行大權交給了拉丁美洲国家，并以為肯尼迪已完全忘記了對古巴采取軍事行動；他似乎并不了解，這不过是肯尼迪在玩弄政治手腕，想借用拉丁美洲国家組織的招牌來掩蓋他準備對古巴發動的軍事侵略，就像美国利用联合國的招牌來掩蓋它对朝鮮和剛果的侵略那样。

事实上，對古巴革命感到芒刺在背的肯尼迪政府，一分鐘也沒有放棄过武装干涉古巴的計劃。这点从美国統治当局的言論和行动中就可以看出。去年四月，美国雇佣軍在古巴的吉隆灘登陸失敗之后，肯尼迪当时就咬牙切齿地表示：“事情還沒有最后結束”。到十月，腊斯克又再次声明，美国决不能同古巴革命政府“和平共处”，并宣布肯尼迪說过的“在必要时”美国將對古巴采取单独行动的話仍然有效。十二月，腊斯克又在一次電視節目中叫嚷：整个南半球必須非常認真地考慮打倒卡斯特羅政权。今年二月初，美国国防部长麥克納馬拉在“組織西半球防務”“免遭来自古巴的威脅”的借口下，更派出大批美国的海軍和空軍不斷對古巴进行挑衅性的“海空監視”。同时，肯尼迪政府在美国的邁阿密、新澤西、路易斯安那等地和危地馬拉、委內瑞拉、多米尼加等国家中，對古巴的反革命分子正在加緊进行作战訓練。



显然，在如此紧张的准备下，这位鲍威先生还要对肯尼迪政府进行指责，未免太“冤枉”了。不过，比较一下华盛顿当局对古巴的刻毒咒骂和它的实际行动，鲍威之流自然觉得是不够“过瘾”的。几年以来，叫喊古巴是“共产党进入拉丁美洲的跳板”的是美国，宣传它“威胁了美国和西半球安全”的也是美国。可是华盛顿的负责人士直到今天还是一味在焦急拉丁美洲国家来“共同行动”，并没有像鲍威之流所主张的那样贸然派出美国军队，这就难怪要引起鲍威之流的不满，也难怪要被《纽约时报》的记者赖斯顿讥讽为“言论像丘吉尔，行动像张伯伦”了。

富于“新边疆”冒险精神的肯尼迪政府对古巴革命恨入骨髓，但是对于这个只有七百万人口的革命的古巴却无可奈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美国资产阶级评论家李普曼在今年一月二十五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向那些主张对古巴采取冒险行动的狂热分子发出了这样的警告：“由美国占领古巴，推翻卡斯特罗、建立一个我们喜欢的古巴政府”的政策，“将会带来巨大和深远的后果。……全世界的轰动将是巨大的。泛美体系将崩溃。不管卡斯特罗本人在古巴会遭到什么，同反美主义相结合的卡斯特罗主义将在本半球泛滥。”

卡斯特罗不是被肯尼迪宣布为十恶不赦的魔王吗？清除魔王应当是“大快人心”，怎样反而会使美国操纵下的“泛美体系瓦解”，并使世界为之震动呢？

显然，美国统治当局对古巴革命的各种造谣和中伤，在这里完全陷入了不能自圆其说的泥坑。

事情其实是极明白的。古巴革命是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大庄园主制度的汹涌澎湃的革命斗争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它同拉丁美洲人民血肉相连。因此，保卫古巴革命也就是保卫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拉丁美洲人民之不允许多美帝国主义向古巴伸出它的血手，从这样一件事就能看出，即美帝国主义每采取一项敌视古巴的新行动，就必然要激起更剧烈的反美风暴。去年四月十七日美国派遣雇佣军入侵古巴、今年一月底美国在埃斯特角会议上孤立古巴的行动，都引起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游行示威，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中的美国大使馆遭到群众的袭击。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浪潮更加汹涌而无法阻挡。

革命的古巴这样普遍地受到拉丁美洲人民的爱戴，甚至连西方资产阶级的一些报刊也不能否认。加拿大的资产阶级报纸《环球邮报》早在去年就承认：“任何拉丁美洲国家政府只要公开反对卡斯特罗总理，就不仅会在今后的选举中招致自己的失败，而且还会冒……爆发骚乱的风险。”美国垄断资本的喉舌《新闻周刊》不久前也说：“千百万拉丁美洲人现在感到不满”。它还说，在一九六二年，他们中间将有越来越多的人注视着菲德尔·卡斯特罗，希望从他那里找到摆脱绝望的贫困处境的出路。

美国统治集团并不是不想直接出兵对古巴进行军事冒险，但是，七百万英雄的古巴人民同仇敌愾、团结一致的大无畏气概，使美国统治集团不得不实行一点“自我克制”。古巴人民的英勇斗争曾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历次破坏和侵略活动，它无疑会使踏上古巴



領土的美国侵略軍陷入受人民包围的草木皆兵、四面楚歌的困境中，最后碰得头破血流。李普曼似乎已看到了这一点，因为他已經在預言，美国如果派兵侵入古巴，就会陷入在古巴的游击战中，“类似英国在馬來亚的战争，法国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他还說，“沒有任何理由认为，干涉古巴只要进行一次短暂的、迅速的和干脆的作战就可以了。不可能是这样，这将是——場持續的糾纏。”

显然，肯尼迪政府所以对派出美国軍隊进攻古巴心存疑惧，就是憐于古巴人民力量的不可侮，同时害怕进一步触发拉丁美洲沸騰的革命形势，害怕进一步触发广大的亚洲和非洲地区的革命形势，害怕更加激起世界广大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怒火。因为这些都构成了它在政治上的孤立和軟弱，是它最害怕承认的。但这一切偏偏为那位威廉·鮑威先生所不解。他的愚蠢而坦率的問題恰好触及了肯尼迪政策的痛处，又怎能不受到白宫的冷冰冰的对待呢？

肯尼迪政府因对古巴政策的失敗而在他們自己人中間受到埋怨，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以《紐約时报》的讀者来信栏而論，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例如，二月十七日，一位署名勞倫斯·貝爾斯的讀者，就对肯尼迪政府在美洲国家外长會議上孤立古巴結果反而出丑的愚蠢行动憤怒地說：“人們一定应当問一問，美国代表团不久前在埃斯特角外长會議上所采取的立場是不是一种最好地为我们国家利益服务……的立場”。这位讀者列举了会后的不愉快事实：“（美国）各大使館破裂的窗口，遍及拉丁美洲各国首都街头的騷动，甚至死亡……美洲国家組織中最有影响的一部分国家甚至拒不同意一項（对付古巴的）折衷

的解决方案”，然后問道：“难道紙面上的胜利能够同这类激烈的后果相适应嗎？”“难道古巴真的比以往更加大大孤立了嗎？現在拉丁美洲国家对于外来的有害主义的傳播难道真的更有了免疫性嗎？”最后写信者說：“冷靜的反省会表明，我們的国务院仍然缺乏一項有力的古巴政策。”

这位勞倫斯·貝爾斯先生虽然没有明显地要肯尼迪立刻出兵占领古巴，可是他同样认为，美国在埃斯特角會議上发表对古巴的強硬声明和孤立古巴的政策十分不中用。

直接出兵古巴将带来不可預測的巨大灾难，孤立古巴又无济于事。正是这种进退維谷的处境，使肯尼迪政府手足无措。

不过，“可詛咒的古巴革命”为华盛顿带来的苦恼还不限于此。由于要急切寻求一項“有力的古巴政策”，来达到扑灭古巴革命的目的，肯尼迪政府不得不决定以资本主义世界盟主的身份，动员整个西方世界来对古巴实行經濟封鎖，这就是国务卿腊斯克今年二月初所宣布的“半球以外的国家应该考虑調整它們对古巴的政策”并“重新檢查它們与古巴的交往”。

但是这一“新政策”也只是招来更多的耻笑。英国《每日電訊报》对这一政策的評論是：“古巴問題在許多方面已成了美国专心对付的一个問題”。“自由世界其他国家应该設法不要牽連在內”。《泰晤士报》則嘲弄地指出，这个号召直接違反了美国自己宣布的門罗主义，因为这个主义原規定不許欧洲干預美洲的事务。一直拒絕执行美国所提出的經濟封鎖的建議的加拿大，更是乘机进行了冷嘲热諷。加拿大《環球郵报》二月二十八日的社論說：“在上月份的埃斯特角會議上，因美



国施加重重压力……来安排把古巴驅逐出美洲国家組織。但是这一行动远沒有吓倒古巴，却暴露了在美洲国家組織中的严重分歧。現在，美国派了国务院政策計划机构負責人华尔特·罗斯托去巴黎，以說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来支持美国对古巴的政策——特别是与古巴断絕一切貿易。这样，美国似乎断然要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重犯在对待美洲国家組織上的錯誤。而这一次的賭注代价更高了，联盟的成員也不那么屈从于美国的压力了。”加拿大《环球邮报》的分析并没有錯，因为負責去說服西欧国家对古巴实行禁运的专使华尔特·罗斯托，由于看到風色不对，只在巴黎勾留了一天多，就灰溜溜地轉回了华盛顿。

在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問題上一再躑躅的情况下，《紐約时报》的記者馬克思·弗兰克尔不久前在一篇論及美国对古巴政策的文章中

不得不牢騷滿腹地說，卡斯特罗“已經成功地扮演了大卫的角色来反对北方的歌利亚”。

按照聖經《旧約全书》的《撒母耳記》，歌利亚是一个“身高丈余，头戴銅盔，身穿鎧甲，甲重二百磅，腿上有銅护膝，两肩之中背負銅戟，枪杆粗如織布的机軸，铁枪头重二十五磅”的无敌巨人。而大卫只是一个小小的牧羊童。但是这个牧羊童竟用几顆石子就击斃了歌利亚。

看来，無論是这位記者先生，还是那两个《紐約时报》的投信人都不明白，古巴能够抵抗得住強大的美帝国主义的真正原因是：前者的事业是正义的，它代表人民的利益，因此得到世界人民的广泛支持；而后者代表历史的黑暗面，因此，为全世界人民所唾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种情况是美国国务院的任何“有力政策”所不能改变的。

肯尼迪与产业后备军

陈 原

幻象乎？现实乎？

去年七月，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一篇妙文，其中說到，美国的失业大軍，纯粹是外国人头脑中的“幻象”，那样的美国其实是“非真实的美国”云云。轉述恐怕失真，下面是这篇妙文中的一段：

“在美国，另外一个討論得很多的题目就是失业。人們常常发表許多数字，这些数字又被外国报刊所引用……；还有一层，讀者

們竟以为‘失业’和‘失业者’或‘无业者’这几个詞儿，跟法文的 chômage (失业) 或 chômeur (失业者)，……意义完全一样。而且并非所有美国人，更不必說会有多少欧洲人——如果有的話——能够知道，凡是連續两周沒有工作而又自願工作的人，都被当作‘失业者’被編入美国的統計里，尽管这人很年青，先前从不曾工作过，也不論他的性別、年齡、結婚与否等等。”

这段话虽然說得抑揚起伏、轉弯抹角，



还夹杂了一串外国字，但究其实不过想宣扬这样一种观念：失业问题在美国只不过是“非真实的”统计问题；问题之所以显得严重，是统计学出了毛病，是语言学出了毛病。于是，腐烂到骨髓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美国所永远不能彻底解决的社会矛盾之一的失业问题，就这样轻轻地给几句花言巧语所冲淡，淡得似乎连影子都没有了。

这篇妙文发表后两个月，所谓“世界销量最大的”杂志《读者文摘》，也抱怨起发表那日益增长的失业数字的机关来了，说它之所以这样做，实际上是居心不良，“给共产党活动提供良好的饲料”，而其动机不过想为联邦预算增加几文钱，或者想要政府对经济实行新的管制而已。

被抱怨的对象是劳工统计局。这个机关的负责人也出来说话了，那便是发表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记者与局长的对话录。在这一问一答当中，局长不知有意还是无意，赶紧说明自己所提供的“饲料”完全是无足轻重的。有对话录中的一段为证：

“问：这样看来，美国的失业问题实际上不如世界传闻那么糟糕吧——

“答：不，并不那么糟糕。我们发表的数字之所以出问题……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我们的全日失业者数字，比方说，百分之七，其实包括很多分量很轻的失业者，……他们对于家计或对于经济都没有什么重要性。有些人是新找工作的，他们从来没有被包括在劳动力里面。有些是间歇性或偶然做做工的工人……还有些是季节性的农业工人。”

局长先生和《外交季刊》于是分别到达了这样的结论，即：失业统计里面算不了失业的数目太多，所以看上去显得很令人不安，

其实是没有什么的。失业大军在美国，不过是人们的“幻象”而已。

于是，劳工统计局便像往昔一样，继续每月发表它的失业数字。例如，不久前发表了二月份全日失业的人数是四百五十四万三千人。不料这个数字却依然引起好些美国报刊的焦虑，它们发表了不少忧心忡忡的评论，因而再一次提醒世人：原来这个国家的失业问题并不是“幻象”，却是如美国报刊所谓的真正存在的“不愉快的事实”；“仍然是个紧急的问题”。

在这当中，《纽约先驱论坛报》写道：“宾夕法尼亚州生产钢材和无烟煤的城镇里，失业人数自一九六〇年秋天以来不曾有所减少。新英格兰的纺织区、西弗吉尼亚州的煤矿城镇、底特律的汽车制造中心、俄亥俄州的钢铁城市和明尼苏达州的铁矿区的情况也是一样。”

这就是被称为“幻象”的**四百五十四万三千**这个数目字的不完全的具体描写。只有“全能的上帝”才有本领在这当中分辨出多少是“失业者”，多少是“无业者”。这个数字既包括了由大约七十万入构成的美国俗语所说的“硬核”（官方的定义是指连续失业在二十六周即半年以上的人），也包括所谓“对家计对经济”都无足轻重的新劳动力——十六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们。这批新踏入劳动力市场去寻求维持生活饭碗的人每年都有一百多万，可是社会却对他们紧紧关闭了大门，连美国的劳工部长也不能不表示，这部分新生力量找不到维持生命的道路，实在是“失业中最威胁的一个方面”了。

但是，美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都知道官方每月公布的失业数字，并不能真正代



表真实的美国。

首先，这个数目故意漏列了许多因为对工作已经绝望而不再去申请工作的人们。许多领完微薄的救济金（许多州规定只发十几周），因而不再去申报的大批失业者，也没有被统计在内。去年六月号《经济札记》揭露说，“政府调查员询问失业工人他是否在积极找工作。如果那工人说否，那么调查员就将他计算为‘不在劳动力之内’，除非那工人主动声明，因为无工可找所以不找。调查员奉到特别指示，不要询问工人为什么不去找工作。”像这样的实际上失业而又故意被漏列的，据美国有些经济学家估计，约有一百五十万人，他们是在“失业”统计里面找不到的。

其次，那些自愿整日工作而又只能找到几个钟头工可做的半失业者，也并没有被编入官方每月公布的失业统计数字里。这就如半个世纪以前列宁所早已指出过的，“美国的统计表明，在所有的工人中，几乎有一半不是整日工作的”。美国劳工研究会和别的团体，常常把这些被迫半失业的人数折算成全日失业人数，据保守的算法，这个数字有一百二十万，计算得稍宽则有一百五十万。

另外，官方公布的失业统计也没有将那些“名义上有职业但实际上没有作工”的人计算在内。比方说，因气候恶劣而停工的工人，一般是不发工资的，但是统计里不把他們算做失业；有些行业的工人，生病一周以上就不发工资，“停薪留职”了，当然也不算失业。据美国一些经济学家的估计，这类人也近一百万。至于在外面流浪的大批农业工人，有时找到可怜的临时工做做的，自然更没有计算在失业数字里了。

光是上面举出的三部分在饥饿线上挣扎

而不被列为“失业”统计的，就有四百万人上下。这样，不列入统计的实际失业人数就几乎等于官方公布的失业数字，可见官方数字远不能反映这个国家失业的真实情况。美国的统治集团当然是懂得这内幕的，所以他们的焦虑心情，有时不免在报刊上略为透露一二，那倒是比一些替主人搽脂抹粉的谎话更能反映“真实的美国”。

“充分就业”的秘密

去年这个时候，美国有一个自称为“独立的、非政治性的、非赢利性的”，并且“相信通过有效的私人计划便能够避免实行‘计划经济’（1）的”团体——“全国计划协会”，发表了由六十九个“著名”企业家和“工会领袖”联合署名的关于失业问题的“声明”。这个“声明”作了种种建议，以便肯尼迪上台以后十二个月中将失业数字“迅速地减低到一个可以容忍的水平”。

什么叫做失业的“可以容忍的水平”呢？它不是别的东西，正是美国资产阶级所常常宣传的“充分就业”。例如，上面这个团体建议，在十二个月中将失业率（失业人数占全国劳动力的百分比）压到百分之四，这就叫做“可以容忍的水平”了。

大约差不多同时，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提出了一份报告，其中也说道，“以百分之四的失业率作为合理的目标，可以充分利用资源而保持合理的物价稳定。”

肯尼迪总统于是拍了板：要将失业率稳定在百分之四！

虽则将拥有百分之四的失业人数——如果以全国劳动力为七千万计，那就是二百八十万失业大军——叫做“充分就业”，这是很



可笑的（而且在十多年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推荐的还不过是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但是，一年很快过去了，到今年二月，失业率仍然没有被压到百分之四，而是比百分之四高出很多的百分之五点六。看来，连将失业率压到百分之四也很不容易，所以，今年肯尼迪只好又下决心，要在未来的十二个月里面达到这个目标了。

为什么资产阶级要定下一个“合理的”失业率，而把它宣布为令人满意的“充分就业”呢？《纽约时报》去年八月发表的一篇伦敦通讯揭穿了秘密：

“最近的记录无疑地表明，英国失业为百分之二点五时，比起百分之一点五以下时，薪金增加得慢些。……因此要让英国货的价钱下降到能在外国市场竞争，要达到这个最重要的目标，那就只有保持若干失业。……”

原来如此！这位记者讲的虽是英国，但美国要保持一定数量的产业后备军，其理由也许比英国还要多一些，比方《经济札记》就指出，美国资产阶级认为，“如果没有庞大的永远失业的大军，劳工的谈判力量就会‘太高’了。”

其实资本主义要保持相当的产业后备军这一点，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已经看透了。他当年写道：

“英国工业在任何时候，除短促的最繁荣的时期外，都一定要有失业的工人后备军，以便在最活跃的几个月内有可能生产市场上所需要的大批商品。”

有了这样的产业后备军，资本家就会对罢工的工人说，“如果你们不愿意在我的油锅里受煎熬，那你们可以到火里去散步。”

在美国，这种后备军多到被《华尔街日报》称为“劳工情况中的黑点”，这黑点太大，威胁到资本家的安宁，所以华尔街大老板们有时也不免为此心焦。但是归根到底，资本家只愿意将这失业大军减低到一个“可以容忍”的水平，而不愿意（当然也不可能）将它彻底“裁”掉。

这就是所谓“充分就业”的秘密。

大炮、火箭和产业后备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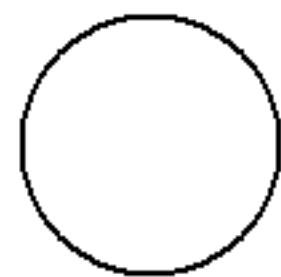
大炮和火箭能够减少产业后备军吗？

美国的好战经济学家回答说，能！哈佛大学的汉森教授——这位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五年前分析了战后时期美国经济状况以后，在一本著作里喜形于色地夸口道：

“军事开支给了我们就业机会，而充分就业给了美国企业以空前的消费品市场和资本财货市场。”

这位教授去年又在另一本新著里大声疾呼地说，“国防（这就是军事开支的代名词——引用者）当然是我们面对着的最高无上的论题。”教授的意思是说，军事开支既然是“最高无上”，别的开支就应该让路，不过不要紧，按照这位教授的“理论”，大炮和火箭是能够“扩大就业”的。

这些年来，美国的军事开支真正是“最高无上”的了，它乘着喷气飞机年年高升。远的不说，肯尼迪上台第一年就将军事开支比上年度提高了六十亿美元，第二年又提高了三十亿美元，而据克利夫兰信托公司的《商情汇刊》说，“战前一九三九年国防开支只不过略高于十亿美元”。也是这家公司指出，当今的美国“所生产的货物和劳务每一百元里面约



莫有十元”拿去用于“国防”了。

随着军事开支的增加，那位教授所断定的减少产业后备军的情况并未出现，相反，产业后备军倒亦步亦趋，不断地往上增长着。根据美国官方历年公布的失业统计——人人都知道这些数字是大加压缩了的，从战后到侵朝战争时期（一九四六——一九五三）这八年間，美国平均每年失业人数是二百五十多万人；侵朝战争失败以后到肯尼迪上台之前（一九五四——一九六〇）这七年里，军事开支还是不断地上升，但是，这个期间平均每年失业人数却没有维持在二百五十多万的水平，反而涨到三百五十多万了。

至于肯尼迪政府上台的第一年，如上面所说，军事开支大幅度地往上提，可是“就业”情况却并不那样可喜，失业大军在去年二月份曾高达五百七十多万人，以后虽然稍为降下来，但到年终还保持四百零九万，比之上举的两段时期的平均数，显然是增加了。

今年年初，白宫大约觉得欢度圣诞节时“仅仅”有四百多万失业者，是很值得高兴的了。所以肯尼迪在一月的《国情咨文》中告诉人们，美国经济如今已经走出了“衰退的深谷”，多谢上帝，它居然走上“复苏”的“康庄大道”了。原来这个阶段叫做经济的“复苏”。也许这“复苏”会给就业带来什么“奇迹”吧？不識相的《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驱报》却对这美丽的想像泼了一盆冷水。这个报纸最近列举了战后美国的三次“复苏”时期十



遗产税

江帆

——这是杰克的“遗产”

——有遗产，好呀，那就请交遗产税吧！

一个月里面所能增加的就业机会，发现从一九四八年到今天，每一次“复苏”所提供的就业机会都比上一次减少。不过，以前三次“复苏”中就业的数目倒还可观：第一次三百四十六万，第二次两百一十七万，第三次几乎到两百万。可是这一回走出“衰退的深谷”，却只有九十五万五千个就业机会等待着多于它几倍的产业后备军……。

这本来就是一条很简单的真理：大炮和火箭是创造不出牛油来的——由于军事工业的畸形发展所造成的虚假的“繁荣”，并没有也决不能够缓和资本主义本质所产生出来的社会矛盾。这样，在两百七十多万“武装到了牙齿”的美国侵略军后面，紧紧跟着四、五百万饥寒交迫的产业后备军及其妻儿；这就活灵活现地显露出一只纸老虎的形象来。



論考茨基主義

理夫 李思溫 王福如

的社会产物，是口头上忠实于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必然結果。考茨基主义作为当时一种国际性的思潮，如列宁所指出的：“一方面是第二国际腐化解体的結果；另一方面是在整个生活环境的影响下被資产階級偏見和民主偏見所俘虏的小資产者思想的必然产物。”^③

第二国际是在一八八九年建立的。第一国际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爭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基础，第二国际則是給工人运动在許多国家的广大发展准备基础的时代。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到十九世紀末，欧洲工人运动向横广方面迅速发展，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的傳播，西欧各国相继建立了工人階級社会主义政党。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資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西方的資产階級革命已經結束，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这个时期的西方工人运动，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工人階級在当时的任务，不是立即实行决战，而是尽可能利用各种合法斗争

恩格斯曾經說过：“誰要是稍微詳細地研究現代社会主义，誰也就應該研究运动中那些‘已被克服的观点’”。他认为，这种研究不仅仅保有历史性的趣味，而且具有现实的意义，因为当社会上产生这种观点的基本条件还存在的时候，这种观点或者它的各种倾向总会一再地表现出来。“如果这种倾向日后具有了較为稳定的形式和較为明确的輪廓，……那末它为了規定自己的綱領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輩人物那里去”^①。

現在，我們回顾一下早被历史所駁倒并为工人階級所唾棄的考茨基主义，对于了解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义的各种反馬克思主义观点，是很有益处的。

卡尔·考茨基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过很大影响的人物，他是第二国际的一个以“中派”形式表现出来的机会主义派别的代表，是一个曾經做过馬克思主义者的无产阶级叛徒。列宁說：考茨基是这样一种人的最鮮明的典型，“他們用明显的詭辯閹割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他們承认馬克思主义的一切，但是把使用革命的斗争手段、宣傳和准备革命斗争并用这种精神教育群众除外”^②。考茨基主义是第二国际矛盾

①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第二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莫斯科1954年中文版，第529、530頁。

② 《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91頁。

③ 《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4頁。



的机会，組織和积蓄力量，为未来的革命搏斗作好准备。

在恩格斯指导下，第二国际在它活动的初期，曾經不断地进行反对右傾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玩弄“左”的革命詞句，拒絕进行組織群众、积蓄革命力量的工作，要求立即实行毫无准备的总罢工，反对利用资产階級議會民主，否认任何合法斗争的必要性。右傾机会主义者則反对革命的階級斗争，宣揚所謂社会和平和階級合作，他們把議會合法斗争看成是无产階級唯一的斗争形式，把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稍許改善工人階級生活状况的經濟斗争說成是工人階級的最終目的，他們为着极少数工人的暂时利益而牺牲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由于恩格斯不懈地斗争，第二国际在一八九六年倫敦大会以前对机会主义的批判，使工人运动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各国社会民主党在合法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經驗。

十九世紀末，資本主义开始走上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階級用从殖民地搜刮来的大量超额利潤进一步腐化了工人階級的上层，在工人階級队伍中間造成了一个为数不多的官僚和贵族阶层。这个阶层的人物过着一种比較安定和“文明”的生活，他們依靠资产階級的“恩惠”而摆脱了破产的貧困的大众所遭遇的灾难和痛苦，也就丧失了破产的貧困的大众所具有的革命情緒。当时的客观条件又把許多小资产階級“同路人”吸引到社会民主党队伍中来。这些情况使工人运动內部机会主义思潮滋长起来。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以后，以伯恩斯坦为首的一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首先起来攻击馬克思主义，提出一套完

整的修正主义理論。这种修正主义思潮在工会的上层官僚分子和知識分子中找到了很多拥护者，以致逐步在許多社会民主党內占了上風。

在第二国际居于领导地位的一些“正統的”馬克思主义者，被长期的“和平”环境和合法斗争的某些成績弄得神智不清，他們盲目地崇拜这种合法性。他們不仅沒有給当时的机会主义思潮以有力的批判，而且用妥协、調和的态度，纵容和助长了机会主义的发展。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以考茨基为首的“正統的”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只是一些隱蔽的机会主义者。在他們的领导下，第二国际虽然也曾通过了一些革命的宣言和声明，但目的却不是为了付诸行动，而是为了騙取群众的信賴，繼續操纵工人运动。但是，到了階級公开冲突和革命的时机，原先隱蔽的机会主义，就完全暴露出来了。战争更加速了机会主义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的領袖們立即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站到社会沙文主义立場上。于是，作为无产階級国际組織的第二国际，終于完全破产了。

列宁对第二国际的历史曾經作了这样的估計：第二国际“已經完成了广泛傳播社会主义、預先地初步地极简单地組織社会主义力量这件非常重要而有益的工作”^①，但工人运动向橫广方面的发展，却又不免使革命的水平暂时降低，机会主义暂时加强；第二国际“給了无产階級許多特別需要的宝贵的艺术，即緩慢地、坚持不懈地、有系統地进行

^① 《死去的沙文主义和活着的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9—80頁。



广泛而又广泛的組織工作的艺术”^①，但同时却使大多数工人政党的領袖因习惯于和平时期而丧失了从事革命斗争的能力。

考茨基主义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环境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

卡尔·考茨基，一八五四年生于布拉格，一八七四年在奥匈帝国維也納参加社会民主党。这时，他并不是一个馬克思主义者，正像他自己所說的：“在我研究社会主义的初期，我极不同情馬克思的理論。我对于馬克思理論曾采取批評的和不信任的态度”^②。一八八一年考茨基在倫敦結識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直接影响下，开始信仰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馬克思主义者。从一八八三年起，考茨基长期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論杂志《新时代》的編輯。他写过大量宣傳和解釋馬克思主义的著作，对于馬克思主义的傳播起过积极的、有益的作用。当恩格斯在世的时候，考茨基同恩格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受恩格斯的委托，在恩格斯逝世后，編輯出版了馬克思《資本論》第四卷手稿，即《剩余价值学說史》。所有这一切，使考茨基博得了“正統”馬克思主义者的声誉，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內公认的有威望的理論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当时工人运动中处于先鋒队的地位，考茨基也就成了第二国际最著名的思想家和理論代表。

考茨基从来不曾真正理解革命的、战斗的馬克思主义。他是一个学究式的知識分子，滿身沾染着德国小市民的庸俗习气。馬克思曾說他是一个“平凡而无远見的人”、“是个天生的俗种”。恩格斯也說他“是一个純粹的学究和經院哲学家，他不但不能把复杂的問題

弄清，反而把简单的問題弄复杂了。”^③在参加工人运动以后，考茨基始終沒有拋棄资产階級民主主义的世界观。即使在他还是一个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在他那些直接反对机会主义、基本上是革命的著作中，也包含有許多对馬克思主义片面的不确切的解釋和对于馬克思主义中某些重要原理的閹割和背棄。

在第二国际的整个期間，各国社会民主党內的革命派为反对机会主义进行了尖銳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考茨基在許多原則性問題上，例如在反对拉薩尔主义的問題上，在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問題上，在对待法国米勒兰主义的問題上，不止一次地表现了动摇态度和失节的行为。对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考茨基虽然也表示反对过，但又作了机会主义的让步，甚至还为伯恩斯坦辯护。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甚至說：“伯恩斯坦沒有使我們喪失信心，而是使我們思考。为这一点我們應該感謝他。”^④到一九〇三年他还說：党內有沒有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对他來說是不清楚的。他并公开地招认：“我起来反对伯恩斯坦是极勉强的，而且向来只是被迫的”^⑤。

一九〇〇年，在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

- ① 《无产階級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4頁。
- ② 考茨基：《土地問題》序言，三联书店1955年第1版，第9頁。
- ③ 轉引自叶·斯捷潘諾娃：《恩格斯傳》，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1頁。
- ④ 轉引自普列哈諾夫：《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頁。
- ⑤ 轉引自亚金：《二十世紀初期德国工人运动的高漲》，莫斯科1954年俄文版，第102頁。



上，形成了一个新的派别——“中派”，考茨基成了这个派别的主要领袖。“中派”以所谓不左不右、不偏不倚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实际上在一切重大问题上总是倒向机会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列宁对于“中派”曾作了如下的描述：“所有‘中派’分子都赌咒发誓，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说他们赞成和平，赞成从各方面‘逼迫’政府，赞成坚决‘要求’本国政府‘表达人民的和平意志’”^①。但是，他们“不宣传革命，不进行忘我的革命斗争，而捏造各种最卑鄙的——听起来好像是绝顶‘马克思主义’的——借口来躲避革命。”“‘中派’是被腐败的合法性侵蚀了的，被议会制度等等环境败坏了的顽固派，是惯于找个安乐窝和‘稳当的’工作的官僚。”^②这样的“中派”不过是改头换面的、表现得更为狡猾和隐蔽的机会主义而已。考茨基后来成为叛徒，成为彻底叛变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完全不是偶然的。

二

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发展到空前尖锐化的地步。如何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命运，如何对待帝国主义，这是区别当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的机会主义者的主要标志。是揭露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呢，还是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呢？“是前进，使帝国主义所产生的种种矛盾更加尖锐、更加剧烈呢，还是后退，缓和这些矛盾呢，——这是对帝国主义的批评中的根本问题”^③。考茨基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全面地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考茨基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并写了《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同盟》等小册子。在这些文章和小册子中，他以“理论家”的姿态，杜撰了一整套所谓“超帝国主义”的“理论”，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伪装下，专事掩盖帝国主义的重重矛盾。

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是这样提出问题的：“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我们所要了解的帝国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个词今天随时随地都在应用，可是人们越多地使用它，谈论它，它的含意也就越不确切，这当然也就使人对它很难进行任何了解。今天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把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现象；诸如卡特尔、保护关税、财政统治乃至殖民政策，全都概括到帝国主义的名下了。按照这样的意义来理解，帝国主义当然也就是资本主义生存所必需的了”^④。考茨基这段话实际上是说，卡特尔、财政资本虽然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现象，但不是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他把卡特尔、财政资本的垄断制和帝国主义分开，企图证明卡特尔、财政资本不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的阶段。考茨基由此出发而否认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否认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

在考茨基看来，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

①②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3、54页。

③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9页。

④ 考茨基：《帝国主义》，1914年9月11日《新时代》周刊（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下同）。



义经济形态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那么,他心目中的帝国主义究竟是什么?他说:“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一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愈来愈多地征服和吞并农业地区,而不管那里住的是什么民族。”^①他还说,帝国主义是“把农业地区归并于工业国家,作为它们的直接殖民地或附属国”的各种“政策”中的一种“政策”^②,是资本主义工业民族实现“扩展的要求的一种特殊的形式”^③和“获取超额利润的手段之一,而不是唯一的手段”^④,等等。考茨基所提出的定义是完全错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恰不是工业资本而是财政资本,帝国主义的特点不只是兼并农业地区,而是瓜分世界任何一块土地,包括兼并工业发达的国家。在这个定义中,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看作仅仅是一种政策,而且把这种政策看作是一种孤立的东西,把它们和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割裂开来,这就背弃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虽然,考茨基口头上也表示反对帝国主义,但他只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兼并政策),而不反对产生这种政策的帝国主义经济制度。“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分开,把政治上的垄断制和经济上的垄断制分开,来为他的那种所谓‘废除武装’、‘超帝国主义’等等鄙陋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扫清道路”^⑤。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这种机会主义观点,是他“全面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那一整套思想体系的基础”^⑥。

考茨基既然把帝国主义政策和它的经济基础割裂开来,于是他就进而认为这种政策

并不是“绝对必需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是可以改变的。他说:“我也不把帝国主义看作是某种不可改变的东西,我认为通过财政资本的另一政策它就可能改变。”^⑦财政资本的另一政策是什么呢?他认为“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的阶段”^⑧。所谓“超帝国主义”(也可称为国际帝国主义),就是各国财政集团达成协议,建立一个超出一国范围的世界财政资本垄断联合。考茨基认为这样就可以“使各国财政资本间的相互斗争为联合起来的国际财政资本对世界的共同剥削所代替。资本主义的这一新阶段是完全可以设想的”^⑨;“可能在资本主义内部造成新希望和新期待的纪元”^⑩。因为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削弱它们自身的力量,因此,“任何一个有远见的资本家今天都要向他的伙伴们呼喊: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⑪如果出现这种局面,那末好战成性的帝国主义就可以变为“和平”的“超帝国主义”了。

考茨基从“超帝国主义”论出发,劝说帝国主义对“最重要的农业地区最好不用帝国

①③ 考茨基:《帝国主义》,1914年9月11日《新时代》周刊。

②④ 考茨基:《帝国主义战争》,1917年2月16日《新时代》周刊。

⑤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5页。

⑥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2页。

⑦⑧⑨ 考茨基:《两本用于重学的书》,1915年4月30日《新时代》周刊。

⑩⑪ 考茨基:《帝国主义》,1914年9月11日《新时代》周刊。



主义的暴力办法,而用和平民主的办法”^①来达到扩张资本的目的。所谓“和平民主的办法”,就是“和农业地区之间建立极频繁的交往、友善的关系,这种关系便于向农业地区输出商品和资本,同样便于从这些地区获取原料。这方面的最好途径是订立尽可能接近自由贸易的贸易协定”^②。他甚至认为自由贸易协定是建立和保障世界和平的最有效的手段。他还把帝国主义描绘成为似乎能够帮助落后国家“提高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以取得“独立和繁荣”。实际上考茨基是为殖民主义者献策,要他们采取更富有欺骗性的手段,借以缓和殖民地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避免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为了实现“和平”的“超帝国主义”阶段,考茨基还把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国家“裁减军备”上面。他说:“如果事情弄到各民族间达成协议、裁减军备和实现持久和平的地步,那末战前曾使资本主义在道德上日益衰落的那些最坏的原因,就可能消失。”^③他肯定地认为当时已经出现了“裁减军备的趋势”,可以期望当时就有“可能”出现裁减军备和实现持久和平的新“纪元”。因为据说由于“战争的教训”,在“战争结束之后,继续进行军备竞赛就没有经济上的必要性了,从资本家阶级本身来看也是这样”^④。这就是说,考茨基相信,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条件下,军备竞赛的阶级基础已经没有了。

列宁斥责考茨基的这种所谓“超帝国主义”的说教,认为这只是“转移群众视线,使他们不去注意现代的尖锐矛盾和尖锐问题,而去注意将来所谓新的‘超帝国主义’的虚假的

前途,用这种极为反动的办法来安慰群众,使他们抱着在资本主义下可能达到永久和平的幻想”^⑤。列宁又说:“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糟蹋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他成了不折不扣的牧师。牧师劝导资本家采用和平民主的办法,并且说这是辩证法:假如起先有过自由贸易,后来又有垄断资本和帝国主义,那末为什么就不能有‘超帝国主义’,就不能再有自由贸易呢?牧师在安慰被压迫的群众,把这个‘超帝国主义’的好处说得天花乱坠,虽然这位牧师甚至还不敢说这个东西能否‘实现’!”“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这些话听起来就特别容易,因为不用担保‘实现’这种远景……),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冲淡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考茨基对战争性质的分析和对战争的态度,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种“超帝国主义”论的机会主义实质。在战争期间,考茨基这个牧师变成了帝国主义战争的辩护士,变成了革命的反对者。

在战争的性质和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上,考茨基打着“公正”的旗号,表示既反对左派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看成是纯粹帝国主义性

①② 考茨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同盟》,1915年德文版。

③ 考茨基:《两本用于重学的书》,1915年4月30日《新时代》周刊。

④ 考茨基:《帝国主义》,1914年9月11日《新时代》周刊。

⑤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87页。

⑥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07、208页。



质的，也反对右派把这次战争說成是“純粹”民族性的；表示既不贊成左派无条件地反对这种战争的立場，也不贊成右派无条件地支持这种战争的立場。考茨基使用一貫詭辯的手法，企图证明这次大战既是帝国主义战争，又是民族战争。他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进步的民族战争混淆起来，說这次战争同十九世紀反对異族压迫的民族战争有相似之处。既然馬克思和恩格斯过去支持过民族战争，第二国际各国党也就應該“有条件”地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所进行的这种战争。在德国議会表决用于战争的軍事撥款时，考茨基不是投票反对，而是棄权。考茨基力图用这种“中派”的幌子，来隱蔽他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場。他說，“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有同等的权利或同等的义务来保卫祖国；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应当因此而責备另一个民族”①。

既然要支持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当然也就要放棄階級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在战争时期，考茨基一再提倡“国内和平”、“階級合作”，宣揚在战时法令的条件下不可能进行秘密的革命工作，任何革命行动都不合时宜。考茨基坚决反对左派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唯一正确的革命口号，而且捏造一些显然愚蠢的思想硬加到左派的头上。他硬說左派好像是这样提出問題的：为了回答战争，群众就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造成革命，实现社会主义来反对帝国主义，否則就是“沒有气节和叛卖”。于是他断言：“这看来似乎是很激进的，但其結果只能把那些不相信立刻实现社会主义的人推到帝国主义陣营中去。”② 他把事情說成这样：仿佛机会

主义者并没有轉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他們无非只是“不相信”立刻能实现社会主义罢了。列宁痛斥了考茨基的这种伎俩，說这不过是那些警察式的文人用来对付革命者的办法。考茨基在证明帝国主义战争具有民族性质的騙局下，以社会沙文主义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这个时候，考茨基不仅把革命問題置之度外（这就已經是背叛社会主义了），不仅在实际上拒絕任何系統的、頑强的革命工作，而且还居然声明說街头游行示威是冒险行为；他不是利用资产阶级在战争时期的困难进行革命，而是帮助本国政府渡过难关。

列宁根据第二国际的教訓，得出一个異常清楚和簡洁的結論，这就是：“国际馬克思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而国际机会主义則是拥护帝国主义的。”③

三

国家政权問題是革命的根本問題。承认无产阶级革命，必須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在国家問題上，在无产阶级专政問題上，考茨基“是一貫傾向于机会主义的”④。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須打碎资产阶级官僚軍事机器、必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些最根本的問題，他一貫采取“迴避、保持緘默、躲躲閃閃”的态度。早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考茨基

① 考茨基：《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1914年10月2日《新时代》周刊。

② 考茨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同盟》，1915年德文版。

③ 《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90頁。

④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4頁。



在這些問題上的機會主義傾向已經開始顯露出來。一八九一年，考茨基為即將召開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愛爾福特代表大會起草了一個綱領草案，就迴避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再三指出的必須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問題，避而不談無產階級專政。稍後，考茨基被迫起來反對伯恩斯坦，一八九九年他寫了《伯恩斯坦與社會民主黨的綱領》一書，但也只是着重從經濟方面批判修正主義，對於伯恩斯坦卑鄙地歪曲馬克思關於“打碎資產階級官僚軍事機器”這一思想的惡劣行為*却不置一詞，從而抹殺了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在這一根本問題上的分歧。他說：“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我們可以心平氣和地留待將來去解決。”^① 列寧指出：“這不是反對伯恩斯坦，同他進行論戰，實際上是向他讓步，是把陣地讓給機會主義，因為機會主義者現在所需要的，恰恰是把關於無產階級革命任務的一切根本問題都‘心平氣和地留待將來去解決’。”^② 一九〇九年，考茨基在《取得政權的道路》一書中雖然批判了機會主義，考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一些迫切問題，並且正確地指出：世界大戰已經迫近，而戰爭預示着革命危機，社會民主黨應當準備在即將來臨的搏鬥中“沿着奪取政權的道路勝利挺進”，但是他仍閉口不談無產階級革命的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務，“既沒有提到‘打碎’軍事官僚國家機器的問題，——也沒有提到同迷信國家的思想作鬥爭的問題，更沒有提到用巴黎公社形式的無產階級機關來代替議會機關和官僚的問題”^③。因此，即使在考茨基這些主要是反對機會主義的著作中，他在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問題上，不僅沒有達到馬克思

主義的高度，而且始終散發着腐朽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氣息。

考茨基在一九一二年同荷蘭社會民主黨左派潘涅庫克論戰時，公然把馬克思的打碎資產階級官僚軍事機器的思想稱為無政府主義。他說：“社會民主黨人與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对立，就在於前者想奪取國家政權，後者却想破壞國家政權。”^④ 在考茨基看來，誰主張破壞、打碎舊的國家機器，誰就是無政府主義者。考茨基雖然也表示，工人階級要奪取國家政權，但在他看來，奪取政權的唯一途徑是通過爭取選票，通過“國家政權內部力量對比的某種變動”^⑤。他說：“我們政治鬥爭的目的，和從前一樣，仍然是以取得議會中多數的辦法來奪取國家政權，並且使議會變成駕於政府之上的主宰。但是，不是破壞國家政權。”^⑥ 這也就是他後來所說的“人道主義和民主的道路”^⑦。他說：“世界革命不是通過專政的道路，不是依靠大炮和機關槍，不是依靠消滅自己的政治和社會的敵人來實現

* 伯恩斯坦在《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一書中，硬將馬克思根據巴黎公社經驗所得出的“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一著名論斷，曲解為似乎馬克思警告工人階級不要採取過激的手段奪取政權。

① 轉引自《列寧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5頁。

② 《國家與革命》。《列寧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5頁。

③ 列寧：《馬克思主義論國家》，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1958年俄文版，第135頁。

④⑤⑥ 考茨基：《新策略》，1912年8月9日和8月16日《新時代》周刊。

⑦ 考茨基：《唯物史觀》第2卷，1927年德文版。



的，而是依靠民主和人道来实现的。”^①他认为这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最近便、最可靠、付出代价最少的道路”^②。

考茨基这种“夺取”政权的思想，是他的超阶级的国家观和极端迷信资产阶级民主的必然结果。考茨基一般地虽不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否认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是在他看来，这一般原理只能适用于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他认为，资本主义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不同，资本主义已经有了普选权、议会制等等民主制度，这些民主制度能够“保护少数，即保护国家的反对派”^③，能够“使国家的全体成年成员、自治体的全体成年成员具有完全的平等权利”^④，因而这时的国家“按其性质来说将不是像过去的国家一样成为少数人的机关，而将成为居民中的多数人的机关，也就是劳动阶级的机关”^⑤；资产阶级国家已经“开始从镇压被剥削者的工具转变为解放他们的工具”^⑥。这就是说，据考茨基看来，似乎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外政策不是由少数垄断资本家，不是依靠资本财富的力量决定的，而是由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决定的，似乎资产阶级民主也能够保护无产阶级和被剥削人民。这样，在他看来，资产阶级民主就成了全民的、“纯粹的”、完美无缺的民主了。因此，考茨基认为，这种“具有普遍平等选举权的民主是使阶级斗争从拳头斗争变为头脑斗争的手段”^⑦，“无产阶级革命在民主已经生根的地方将与资产阶级革命相反，使用‘和平的’经济、法律和道德的手段来进行，而不是使用肉体暴力的手段来进行”^⑧。

由于考茨基在国家问题上的这一贯机会主

义倾向，终于使他在革命风暴的前夕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而当俄国无产阶级起来打碎资产阶级反动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他就更进一步站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上。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震撼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统治，为资产阶级民主敲起了丧钟，第一次使无产阶级专政由理想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对于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也就是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新的焦点。正如列宁所说：“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增长，使得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组织中的代理人拼命寻找思想论据和政治论据，来替剥削者的统治作辩护。在这些论据中间，最主要的是斥责专政和维护民主。”^⑨考茨基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侈谈一般民主、“纯粹”民主，他不分析在阶级社会里民主的阶级性，不区别是资产阶级民主，还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他把十月革命为资产阶级民主敲起了丧钟这件事，当作是世界文明的末日，当作是民主的末日。他积极投入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大合

①⑦ 考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19年德文版。

② 考茨基：《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比》，1946年英文版。

③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7页。

④⑤⑥ 考茨基：《唯物史观》第2卷，1927年德文版。

⑧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参看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2页。

⑨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5页。



唱，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以保护“一般民主”为名，肆意歪曲和丑化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說。

无产阶级专政是馬克思总结历次革命經驗得出的“一个简单、严格、准确、明显的公式”^①，考茨基却把它說成是馬克思偶然提到的一个“詞儿”。他并說，馬克思“在这里（《哥达綱領批判》——引者）所說的不是政体*，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的地方必然出現的一种状态”^②。考茨基还歪曲巴黎公社的历史經驗，把苏維埃与“公社”的原則对立起来。他不仅避而不談“公社”用革命暴力粉碎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避而不談“公社”与凡尔賽以及内部反革命分子所作的斗争，反而把“公社”的缺点和錯誤頌揚为原则，甚至歪曲事实，說馬克思也贊揚了“公社”的“純粹民主制”（既不要专政，也不要集中制）。考茨基然后得出結論說：“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状态，是在无产阶级占压倒多数的情况下由純粹的民主所必然发生的状态。”^③考茨基这些话表明，虽然他口头上談論无产阶级专政，但只是抽象地承认无产阶级的統治状态，而不承认无产阶级独立掌握国家政权，并对资产阶级实行强力統治。考茨基所以要把“专政”解釋为“統治状态”，是企图把統治状态与政权分开，“因为这样就能使革命暴力化为烏有，使暴力革命化为烏有”，从而最終“使革命化为烏有”^④。

考茨基在《无产阶级专政》一书中，同最反动的资产阶级一样，閉口不談无产阶级专政使广大劳动人民享受了真正的民主，而把专政同民主对立起来。他說：“按字义来讲，专政就是消灭民主。自然，单就本义来讲，这个

詞又表示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个人独裁。”^⑤考茨基还把苏維埃政权根据俄国当时情况剥夺反动资产阶级的选举权作为論据，来证明专政已經消灭了民主。他只是一般地談論专政和民主，而不看建立的是哪个阶级的专政，消灭的是哪个阶级的民主。考茨基主張把资产阶级那一套“純粹民主”搬到社会主义来，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资产阶级的两党制（或多党派），同反动资产阶级讲民主、讲平等，至少也应该把他们作为“少数派”、“反对派”保护起来，不这样，专政就是“消灭民主”。

考茨基把布尔什維克党解散资产阶级立宪會議、将苏維埃变成国家机关列为“专政消灭民主”的一大罪状。据他看来，立宪會議乃是一个“全民的”机关，是“純粹民主”的化身，而苏維埃只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战斗組織”。他說：“苏維埃組織已經有了一段偉大的光荣的历史”，“它将在資本与劳动之間巨大而有决定性的斗争中获得突出的意义”^⑥，但它不应该变成“国家組織”。他并且隱瞞了列宁早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就提出的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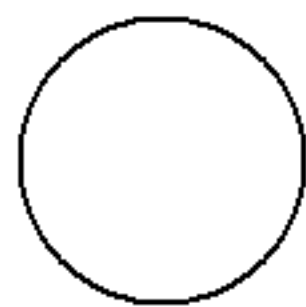
* 无产阶级专政是国体而不是政体。考茨基这里实际上是說，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国体。列宁曾就这一点对考茨基作过批判。（参看《列宁全集》第25卷，第223頁）

① 《苏維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3頁。

②③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参看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4、25頁。

④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9頁。

⑤⑥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参看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4、39、41頁。



維埃是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形式这一著名論断的事实，反而聳人听闻地捏造說，列宁只是当布尔什維克党“在立宪會議中居于少数之后，才得出上述結論，这未免是个遺憾”^①。考茨基所以把专政与民主对立起来，其目的在于否认资产阶级民主是对劳动人民实行的专政，同时抹煞无产阶级专政是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的真正广泛的民主。

考茨基把无产阶级专政誣蔑为俄国落后的特殊产物。他說，由于俄国落后，“他們就越感到不得不依靠行使赤裸裸的权力，即实行专政来替代他們所缺乏的条件”^②。他攻击这种专政是“借助于一个中央集权組織的优势和軍事力量的优势来統治无組織的人民大众”^③，說什么这种专政必然遭到“人民”的反抗而引起“內战”与“恐怖主义”。他說，布尔什維克党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不得不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党专政”与“个人独裁”。考茨基一再攻击列宁，說列宁是一个“独裁者”、“多疑善妒的神”，并且把列宁与党内外机会主义的斗争說成是列宁排除異己。他說：“列宁强求整个工人阶级温順地服从他的领导，如果党内有人对其他领导者表示較多的信任，列宁就把他当成最坏的敌人，用尽一切办法同他作斗争。”^④考茨基这样恶毒地攻击列宁，是为了达到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制度，丑化馬克思主义的卑鄙目的。

考茨基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种种攻击和曲解，表明他完全是以资产阶级民主的市儈眼光来看待无产阶级专政的。考茨基所追求的不过是一个资产阶级議會制共和国罢了。在《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比》一书

中，他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实现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那就是‘自由、平等、博爱’”^⑤。考茨基很像馬克思在一八七七年时所說的“要以新的神話及其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等女神来代替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的那种人^⑥。正如列宁早已一針見血地指出的，考茨基的要求“一点沒有超出资产阶级議會制共和国的范围”^⑦。他攻击俄国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专政，无非是为了拯救资产阶级专政。

四

考茨基对于俄国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布尔什維克党在社会經济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革命措施的攻击，表明他和资产阶级反动派一点区别也没有了。但是，作为“理論家”，考茨基的所有这些攻击，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經济分析”等幌子下进行的。考茨基重复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生产力論”。按照这个“理論”，社会的发展只是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和技术)发展的自然結果，革命阶级不需要有組織、有领导地进行自觉的革命，新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

考茨基在沒有背叛革命以前，曾經正确地談到过革命的客观經济条件和主观能动作

①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參看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9頁。

②③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6、29頁。

④⑤ 考茨基：《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比》，1946年英文版。

⑥ 《馬克思致左尔格》。《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7頁。

⑦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6頁。



用的关系。那时他说：“再没有比下面这样一种意见更错误的了：认识经济必然性就等于削弱意志”，“经济必然性并不等于听天由命”^①。可是在考茨基背叛革命以后，他却成了这种反动的“生产力论”的最热烈的宣扬者。

考茨基否认，由于帝国主义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即在个别国家）首先获得胜利。他在帝国主义时代坚持认为，只有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说：“除非无产阶级已经变成人口中最大的阶级，除非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到小农和小资产阶级已不再比无产阶级的数目多的地步，无产阶级是不能解放它自己的。”^②考茨基还特别强调，如果无产阶级没有具备相当的文化水平、政治经验和管理能力，就不应当过早地实行革命。考茨基不是教育无产阶级积极地去进行革命斗争，发挥他们的主动精神，而是要无产阶级消极地等待资本主义的自行崩溃。不仅如此，他甚至用所谓“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来限制和束缚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他说：“我们应当抱的这种期望，即无产阶级会壮大到，生产力会发展到足以供应人民群众丰富的资料的地步，并且生产力在这时所采取的形式会使利用这些形式的社会机关简化；最后，劳动阶级中必要的经济知识和能保证有效利用生产力的这种良知发展了，这就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前提。”^③

考茨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是资本主义危机和衰退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发展和繁荣的结果，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性质”，资本主义已经“比半

世纪以前具有更大的生命力”。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不可避免地要被“社会主义的调整”所代替这样一种看法，今天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了；相反，他企图证明，资本主义愈繁荣，资本家的财富愈多，社会主义的条件就愈成熟。他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越繁荣和发展，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就越美好”^④，“社会主义（这就是在近代文明的范围内人人享受幸福）只有通过资本主义带来的生产力的大发展，借助于资本主义创造的财富和集中在资本家阶级手里的财富，才能达到。”^⑤那末在这以前，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什么呢？考茨基认为，任务不是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是“提高他们的劳动能力，也就是说提高为资本家阶级创造剩余价值的价值的能力”。据考茨基看来，这样虽然是“延长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寿命”，但却是“通向一个新的、更高的社会形式的起点”^⑥。

根据这种反动的“生产力论”，考茨基断言，俄国由于经济落后，小农占人口的多数，根本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由于战争的破坏，生产水平急剧下降，俄国更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起点。他说，俄国十月革命并不是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而只是最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他公然进行这样的诬蔑：“布尔什维克相信意志与力量万能，他们不考虑俄国的落后状态，要把俄国革命按

① 考茨基：《取得政权的道路》，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50、49页。

②⑤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8、51页。

③④ 考茨基：《唯物史观》，1927年德文版。

⑥ 考茨基：《五一节和反军国主义斗争》，1912年4月26日《新时代》周刊。



着社会主义路綫进行。”^① 由于經濟条件和文化条件都还不成熟，布尔什維克党就不得不依靠强力，“企图通过冒失的跳跃来清除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所出現的障碍物”^②。这就是考茨基所謂的“經濟分析”！正如列宁所說：“这不是‘經濟分析’，这是一场糊塗。这不是馬克思主义，这是片断的自由主义学說，这是鼓吹向資产階級和富农献媚。”^③

布尔什維克党为克服俄国經濟落后的状态所做的巨大努力，为改造国民經济所采取的革命措施，被考茨基一概誣蔑为魏特林、布朗基式的“空想共产主义”。他认为，俄国无产階級还没有能力直接管理生产，不可能把政治的民主轉变为經濟的民主。考茨基責备布尔什維克党实行工业国有化，說什么这是“光靠一紙命令和赤卫队”来实行的“韃靼式社会主义”^④。考茨基反对布尔什維克党“走向社会主义”，同时他又拿自由主义的改良来冒充社会主义。他主張把铁路、航运、鋼铁、机器制造等壟断企业收归国有，然后由国家把一部分工厂出售給生产者，讓他們用生产合作社的方式經營。考茨基說：“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同时并存的可以有……各种形式上极不相同的企业：官僚的、工联的、合作社的、个人經營的”。“有些企业可以交給工会管理，另外一些企业則可以按合作原則組織起来。”^⑤ 这就是考茨基的“社会化綱領”。很显然，这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一种不触动資本主义經濟基础的改良主义。

考茨基认为，在农村中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必須等待农业具备了下述两个条件才有可能：第一是“拥有技术設備，运用科学，拥有最完整的机器設備，使用最新式的方法”^⑥的大农业經濟；第二是“工資劳动在农村的

发展”^⑦，即农业无产者占据优势。从这种观点出发，考茨基竭力攻击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說这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农业。同帝国主义者一样，考茨基誣蔑集体化运动是依靠“野蛮的暴力”发动起来的，集体农庄是“靠强迫劳动維持”的，“是向旧的农奴制和庄园的倒退”^⑧。他硬說，由于农业經濟落后，俄国农民过分牢固地依恋他的私有财产。他說：“我仍旧主張，农民私有和单独經營自己的房子、农場和花园，同时与其他村民一同耕种田地，这样将是最有利的。”^⑨ 因此在他看来，最好是“把大地产收归国有，然后把它分成小块租給少地的农民。这样也許还会实现一些社会主义成分”^⑩。考茨基的这种主張就是要俄国长期保留小农經濟。他居然认为，这样反而会“实现一些社会主义成分”。列宁說：“其实这是小資产階級的口号，其中絲毫也沒有‘社会主义成分’……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的改良。”^⑪

考茨基不仅肆意地嘲諷俄国的經濟落后，人民文化水准低下，說这样的国家和人民根本没有資格实行和建設社会主义；而且，苏联人民为改变落后面貌所作的一切努力，也

①④⑥⑦ 考茨基：《无产階級专政》，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3、70、64、66頁。

② 考茨基：《工人革命》，1925年英文版。

③ 《无产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0頁。

⑤ 考茨基：《社会革命》。轉引自《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7頁。

⑧⑨ 考茨基：《布尔什維主义的死路》，1931年英文版。

⑩ 考茨基：《无产階級专政》，參看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61頁。

⑪ 《无产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7頁。



遭到他的百般非难。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考茨基看来是完全行不通的。他用讽刺的口吻说，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像“是天主教所说的，通到天堂的永恒幸福的炼狱”^①。他抓住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执行中的某些缺点，断言五年计划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他说：“五年计划的实质是什么呢？不过是打乱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平衡。”^②考茨基和苏联当时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一样，特别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他甚至诬蔑说，五年计划是想用“烈性的饥饿疗法，把一个国家由灾难直接引导到丰足”^③。

在考茨基晚年的著作中，对“生产力论”的宣扬愈来愈多，其内容也愈来愈反动。他公然赞美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与工人福利的“增长”，提出“应当不带成见地”重新考察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越繁荣，资本家的收入越多，国家就越能以捐税形式“最迅速地获得它为了实现有利于群众的巨大革新所必需的资金”^④，来改进工人福利事业。而“工人在资本主义之下得到的福利越增长，他们就越安于并容忍资本主义制度，就越放棄一切不可靠的冒险企图”，从而“使社会主义越成为多余的东西”^⑤。他竟然无耻地说，社会民主党“必须公开承认这一点并且放棄我们的社会主义目的，而这并不背叛劳动解放的事业”^⑥。

考茨基的这些议论，全部贯穿着庸人和叛徒的精神。他以庸人的态度把世界历史描绘成一种机械的图式，同时又用叛徒的精神把这一切做为反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论据。列宁在批驳这种庸俗和反动的理论时曾经写道：“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

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普通历史程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⑦考茨基虽然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对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却一点也不懂。当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在欧洲造成了革命形势的时候，他却重复着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教科书”，极力反对俄国工人阶级发动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这就证明他已经完全滚到资产阶级那里去了。

* * *

列宁在揭露考茨基主义的时候曾指出：“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現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疏忽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⑧只要存在着一定的社会条件，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机会主义就仍然会出现。列宁在亲手埋葬考茨基主义的时候，也曾预言：“我们相信几十年以后，在‘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一定会成长起来新的普列汉诺夫、谢德曼和新的和善的调和派考茨基之流”^⑨。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出现，完全证明了列宁预言的正确性。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是老修正主义的继续。温故而知新——这就是考茨基主义虽然早已破产，而我们仍不能简单地把它忘掉的原因。

①②③ 《布尔什维主义的死路》，1931年英文版。

④⑤⑥ 《唯物史观》第2卷，1927年德文版。

⑦ 《论我国革命》。《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5页。

⑧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24页。

⑨ 《世界政治的转变》。《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5页。



充分地发挥技术人员的力量

· 石克俭 ·

充分地发挥技术人员的力量，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我国，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个崭新的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要使生产力有高度的发展，必须充分利用新的生产关系所提供的可能性，组织广大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力量，同心协力，进行长期的、艰巨的努力。这样，才能根本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掌握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占领和开辟新的科学技术领域，迅速发展生产力，需要有一支强大的、熟练的技术队伍，需要把广大技术人员的智慧和力量充分地发挥出来。

对于技术人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我们党从来都是很重视的。十多年来，我们贯彻执行了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在组织和培养技术人员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现在新中国的技术队伍已经逐渐成长壮大起来了。拿全国工业交通系统的技术人员来说，一九六一年底已经比一九五七

年底增加了一倍多。

在现在的技术队伍中，有一部分技术人员是在旧社会培养出来的。这部分人占整个技术队伍的百分之十左右。他们中的许多人出身于非劳动人民的家庭，受的是地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教育，而且在解放前他们做的工作多半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但是，他们和掌握着剥削手段、不劳而食的地主、资本家是不同的。我国的技术人员生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长期地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压迫，政治上是不自由的，经济上一般的是困难的，他们的才能也往往得不到施展。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解放前就具有爱国的思想，希望中国强盛起来，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抱同情的态度，或者持中立的态度。全国解放以后，由于党对技术人员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又经过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各项政治运动的锻炼，绝大多数原有的技术人员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政治思想状况有了根本的变化，有些人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许多人能够深入生产实际，同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相结合，



在技术业务能力上普遍有所提高。这部分技术人员在现有的技术队伍中虽然占少数，但是他們当中的絕大多數人，技术业务水平比較高，經驗比較丰富，在解决技术問題和培养新的技术干部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从大学和中等专科学校培养了許多新的技术人员；在这个期間，特別是一九五八年以来，有許多技术工人也提拔成为技术人员。这些新培养出来的技术人员，約占整个技术队伍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在新的技术人员中有許多人出身于劳动阶级，有的本人原来就是工人、农民或其他劳动者，不少人是共产党员或者是共青团員。这部分技术人员中的絕大多數人，政治觉悟比較高，肯于刻苦钻研，进步也比較快，在許多单位里，他們担負了重要的技术工作。这部分人虽然一般說来技术水平还不够高，經驗还不够多，并且有其他的一些弱点，但是他們是我国工人阶级技术队伍中的新生力量。

上述两部分技术人员，尽管出身、经历各不相同，但是他們都是劳动者，都是为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服务的，从整体来看，他們都是我国工人阶级的組成部分。

十多年来，我国的技术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技术人员的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不过，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需要比較起来，技术人员的数量还是不足的，技术水平一般說来还是不高的。有关部门需要正确地执行党的調动技术人员积极性、扩大技术人员

的队伍、提高技术人员水平的政策；技术人员也应当努力钻研技术，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以便逐步适应国家建設的需要。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对于技术人员的全面要求是又紅又专。紅，首先是要有革命的政治立場，要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专，就是要通曉和掌握專門的业务知識。紅和专的关系，是政治和专业的关系。我們的要求是政治和技术相結合，而不是二者相分离。我們应当积极鼓励和帮助技术人员学习政治，关心政治。但是，不能，也不应当要求技术人员都成为政治家。技术人员自觉地掌握和精通專門技术，用自己的专长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他們对于祖国应当担負的义务，也就是他們的政治任务。技术人员对此应当引以为光荣，別人对此也应当采取欢迎和鼓励的态度。我国目前不是专家太多，而是专家太少。当前的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要培养大批的专业人材。技术工作中的政治领导，就是要根据明确的政治方向，保证搞好专业，培养出精通业务的专家，使专业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

对于从旧社会来的技术人员在政治上的进步，我們应当有足够的估計，要充分地发挥他們的力量。毛澤东同志說过：“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識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願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識分子，我們都应当給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們的关系，帮助他們解决各种必須解决的問題，使他們得以积极



地發揮他們的才能。”^① 技術人員只要肯下苦功夫，不畏艱辛，專心致志，把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貢獻給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應當受到大家的尊重。

正確地安排和使用技術人員，使他們學用一致，發揮自己的專長，是充分發揮技術人員的力量的重要條件。在我們國家，對於技術人員工作的安排，絕大多數是學用一致的，這樣的條件在舊中國是沒有的，就是今天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沒有。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人材的培養和使用也是有計劃的，我們有可能根據技術人員的專長，分配他們的工作，使他們學用一致，避免人材使用上的浪費。不過，由於工作上的缺點，在少數單位對技術人員也有用非所學，或者讓技術人員擔負非技術性的工作的情形。有些技術人員的工作崗位不必要的變動太多，也影響他們業務能力的提高。無疑的，對於這些不合理的現象，應當注意糾正。人材的浪費是一種最大的浪費。我國目前專門人材不多，應當把他們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對使用不當的技術人員，加以調整是完全必要的。這就是說，目前擔任非技術工作的技術人員，應當盡量讓他們回到技術工作的崗位上去；擔任的技術工作和專長不一致的，應當重新安排，充分發揮他們的專長。有的改行以後已經學到新本領的人，如果在現有崗位上能夠更好地發揮才能，當然不需要調整；至於適當的抽調某些技術人員從事新發展的专业，則是十分必要的，在這些新崗位

上的技術人員，應當努力鑽研，掌握新的技術專業。技術人員的工作崗位穩定下來，是有利於他們積累經驗和提高技術水平的。

凡是願意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技術人員，在我們的國家里，都應當一視同仁、量材使用，使他們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有職、有權、有責。全民所有制的工業企業是以現代技術為基礎的大生產，要求科學地、細致地組織和指揮生產。因此，在企業和其他一些技術部門，技術方面的領導職務，一般地要由技術人員擔任，在技術問題上，主要地由技術人員作決定。例如在企業里，總工程師是技術上的權威。他在廠長（經理）或者主管生產的副廠長（副經理）的領導下，對企業的技術工作負全部的責任。各級有關技術管理的專職機構，在技術工作上必須服從總工程師的指揮。經驗證明，只有這樣，才能管理好社會主義企業，促進生產的發展。

為了充分發揮技術人員的力量，各單位的行政領導人員，應該發揚民主，善於傾聽技術人員的意見，遇事和技術人員進行同志式的討論。在技術問題上，任何人都不能採取武斷的態度，當然，也絕不應當把技術上的不同見解，看作是政治思想問題。在科學技術問題上發生了不同的意見，應該根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展開自由的切實的討論，使各種不同意見有充分發表的機會，經過討論找出最好的辦法。同時，技術人員

^①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22頁。



也應該本着對國家、對人民負責的精神，敢于堅持真理，堅持自己的正確意見。

有關部門應該從各方面為技術人員鑽研業務創造方便條件。如合理地安排他們的工作和學習時間，使他們能夠用大部分時間和集中主要精力從事技術工作；根據可能，供給他們必要的圖書資料和儀器設備，給他們提供參加學術活動的便利；必要時為某些高級技術人員配備助手，以減少他們從事輔助性技術工作的時間，使他們能夠集中力量去做主要工作，等等。對於一般的技術人員，也要使他們有深造的機會。對於從工人中提拔的技術人員，尤其要注意培養，幫助他們掌握技術理論，不斷地提高技術水平。

今天我國絕大多數技術人員在政治思想方面已經有了很大進步，他們擁護社會主義，擁護黨的領導。但是思想進步不能到此為止。毛澤東同志指出：“廣大的知識分子雖然已經有了進步，但是不應當因此自滿。為了充分適應新社會的需要，為了同工人農民團結一致，知識分子必須繼續改造自己，逐步地拋棄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而樹立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現在多數知識分子還不能說已經完成了這個轉變。我們希望我國的知識分子繼續前進，在自己的工作和學習的過程中，逐步地樹立共產主義的世界觀，逐步地學好馬克思列寧主義，逐步地同工人農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頓，更不要向後倒退，倒退是沒有出路的。”^①

技術人員的思想改造，需要依靠他們的自覺，通過自己的努力，逐步提高政治覺悟，提高認識。別人的幫助，只能運用和風細雨的方法，進行同志式的批評，而不應當採取簡單生硬的態度。在我國，廣大的技術人員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這是十分可喜的現象。但是，對於技術人員的政治學習不能像對一般政治工作人員一樣要求。技術人員樹立共產主義世界觀，要靠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和政治運動的鍛煉，要靠在生產過程中的實踐，有些專家還要經過帶有一些自己特點的具體途徑，經過科學實踐來提高自己的認識。列寧曾經指出，要幫助技術專家“擴大眼界，要以相當的科學成果和材料為根據，要記住，工程師承認共產主義所經歷的途徑並不像過去地下宣傳員和著作家所經歷的那樣，他們是經過自己研究的那門科學所達到的實際成果來承認共產主義的”^②。列寧的這段話，對於我們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我們在貫徹執行黨的關於知識分子的政策當中，已經取得了豐富的經驗，技術人員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已經作出了許多貢獻。我們必須繼續執行黨的政策，把廣大的技術人員更加緊密地團結在黨的周圍，充分發揮他們的力量，同心同德，建設社會主義。

①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頁。

② 《論統一的經濟計劃》。《列寧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4—135頁。



数理邏輯和形式邏輯

王 宪 鈞

数理邏輯是一門邊緣性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与邏輯学和数学的研究对象是交織在一起的。通过在計算机和自动控制方面的应用，数理邏輯和工程技术又有了密切的联系。这样，数理邏輯所研究的問題，时常既是邏輯問題，又是数学問題，也是工程技术問題。

数理邏輯的发展，从莱布尼茨（1646—1716）提出建立一个使用符号語言的邏輯体系开始，到現在大約有三百年的历史。近几十年来，由于数理邏輯这門科学在现代科学技术中的一些重要部門的实际应用，它的作用日益显著，得到很多人的重視和研究。这門科学发展頗为迅速，并不是偶然的。

在历史上，数理邏輯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数理邏輯不仅与数学有密切的联系，而且同形式邏輯也有深远的淵源。数理邏輯和形式邏輯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問題。这篇文章在說明数理邏輯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同时，拟就数理邏輯和形式邏輯的关系問題，作一些简单的分析。

* * *

数理邏輯既是邏輯学，又是数学。

数理邏輯是邏輯学，乃是因为它的对象包括有推理和证明。数理邏輯对于这些思維

形式的考察，不是从思維的发展运动着眼，而是从形式結構方面来进行的，所以，可以說，数理邏輯是形式邏輯的一个分支。

数理邏輯不仅研究推理和证明，而且研究公理学方法。所謂公理学方法，就是从一些基本命題或公理出发，根据一些特定的演繹規則，推导出一系列的定理，从而构成一个演繹系統。

数理邏輯使用其特有的符号語言。它用公理学方法作它本身的研究方法，同时也还运用一些数学理論作为方法。特有的符号語言和公理学方法，是数学里常用的方法。使用数学方法以研究思維的形式結構，特别是数学思維的形式結構，是数理邏輯的主要特征。

由于数理邏輯使用了数学方法，由于它能够將思維的某些方面作数学的处理，并且能够將这些方面的問題轉換为数学問題，所以，也可以說，数理邏輯具有数学的性质，是数学的一个部門。

数理邏輯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用代数方法来处理古典形式邏輯的推理的时期，这个阶段延續了約二百年。

数理邏輯萌芽于十七世紀末叶。十七世紀是资产階級革命的初期，资本主义还处于



上升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也日益繁荣。由于机器工业、水利、枪炮制造和航海的需要，天文学和力学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当时的自然科学中，力学占着主导地位。力学的发展与数学是密不可分的。数学的成就提供了表达运动的形式及其计算方法，力学的需要又推动了对数学进一步的研究。数学方法在认识自然、发展技术方面，既然起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在人们的头脑里，就产生了把数学方法推广到其他科学领域的思想。人们希望能够用数学方法来研究思维，希望能够把思维过程转换为数学的计算。英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布士一六五五年在《论物体》一书中，曾经明确地提出这样的思想。他认为思维是可以计算的，推理是与加法和减法一样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也有类似的想法。他在一六七七年给哥洛洼的信中说，真正的方法应该能够提供给人们以看得见的和感觉到的媒介，来引导思想，好像几何学中的线条和学习算术者面前的运算公式那样。

十七世纪末叶，简单计算机器的制造有了发展。法国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巴斯格在一六四二年制造了一架简单的数字计算机，莱布尼茨于一六七一年提出了改进巴斯格机器的想法，并且在一六九四年制成了他所设计的机器。所有这些成就，促进了人们把思维过程计算化的思想。

应当指出，并不是一切思维过程都是可以用数学方法来处理的，辩证的思维就是不能这样处理的。作为唯心主义者的莱布尼茨，夸大了数学的作用，幻想思维可以完全

计算化，结果遭到了失败。但是，莱布尼茨提出的思维计算化的思想，其中包含有某些合理的因素，某些思维过程的确是能够计算化的。这是莱布尼茨对数理逻辑的贡献。数理逻辑的发展及其在工程技术上的应用，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用数学方法研究思维形式，不能不对数学提出一些必要的要求，而当时的数学是具备了条件的。十七世纪，数学的发展已日臻完善，通过用字母表示已知数量和未知数量以及用符号表示运算，代数已达到完全符号化。解析几何产生了，人们已经可以用代数方法来描述和研究几何图形。微积分的出现，又使人们可以用几何和代数方法来研究物质运动的形式。这些成就，为用代数方法研究推理提供了线索。

用代数方法研究推理，就必须把命题的形式结构用符号和公式来表达，把推理中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关系，转换为公式与公式之间的运算。为此，就要求对数学里的变项、运算和关系，例如 $a, b, x, y, +, -, \times, =$ 等，给以逻辑的解释。为了表示命题的结构，变项 a, b, x, y 等可以被解释为概念， $+, -, \times$ 等可以被解释为对概念的运算， $=$ 可以被解释为概念间的关系。但是，这些运算和概念间的关系所反映的是怎样的内容，以及它们对于内涵的运算还是对于外延的运算，为要实现思维过程的计算化，这些问题都需要得到解决。

问题的解决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对于思维过程的计算，采取内涵的解释遭遇到极大的困难。莱布尼茨一生中，曾作过多次的



嘗試。其后，經過了許多邏輯學家和數學家的努力，到了布尔(1815—1864)，施履德(1841—1902)和波列茨基(1846—1907)，他們吸取了前人的經驗，采取了外延的解釋，成功地用代數方法處理了演繹推理，后来又經過一些改正和補充，發展成為現代的邏輯代數。

十九世紀末叶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是數理邏輯發展的第三階段。在這階段里，數理邏輯是適應了數學的需要，為了研究數學證明而發展起來的。

數學是關於客觀事物的量的關係的科學。十九世紀以來，由於生產技術和自然科學的發展，數學的應用更為廣泛，並且日益取得更為抽象的形式。數學分析基礎的奠定，非歐幾何的建立，以及集合論里謬論的出現，這些都提出了一系列有關數學方法的問題，說明了研究數學證明的必要。

數學證明，就其完成了的形式而言，是屬於演繹性質的。嚴格的演繹證明，必須是從正確的前提出發，根據推理規則導出結論。前提與結論之間要有必然的聯繫，前提必須是結論的充足理由。不嚴格的證明，時常不是明顯的錯誤，更多見的，乃是前提中的概念不明確，或者是證明中隱含有未被覺察因而未經考慮的前提。掌握了推理的形式和規則，不只能夠檢驗推理過程是否正確，也有助於發現隱含著的前提。十九世紀中叶，數學家逐漸認識到，只憑幾何直觀不足以明確微積分里的基本概念，為了進行有效的和準確的計算，就必須確定一些公式和定理的有效限度，並給予嚴格的證明。對於微積分領

域里的基本概念下精確的定義，確定公式和定理有效性的限度和前提，把推理所依據的形式和規則確切地陳述出來。這些，都是奠定數學分析基礎時所要解決的課題。

對微積分里的基本概念下精確定義，要牽涉到無窮多個數所合成的類，這是一種無窮集合，因而推動了對無窮集合的研究。在十九世紀最後的幾年里，產生了關於無窮集合和無窮數的理論——集合論。

集合論建立之初，就發現了謬論，謬論是邏輯的自相矛盾。邏輯矛盾的出現，往往標誌著思想方法的錯誤。可是，集合論里的謬論並非是簡單地由於推理的疏忽所引起，而是與無窮集合的本質以及對無窮集合所引用的邏輯方法有關，這也不能不引起對於數學中所使用的邏輯方法的探討。

如上所述，從一些公理出發，根據演繹方法推導出一系列的定理，這樣建立起來的數學理論是一公理系統。歐氏幾何是一個古典的公理系統。歐氏幾何里的平行公理（在歐氏原著中是第五個公設）與以下命題相等：通過一點，在平面上只能作一直線與一已知直線平行。兩千年以來，數學家曾經試圖從其他公理推導出平行公理，沒有成功。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俄羅斯幾何學家羅巴卓夫斯基(1792—1856)提出了非歐幾何的報告，他假定了與平行公理相反的命題，並從之作出大量的推演，而沒有遇到邏輯矛盾。這實際上就說明了平行公理不能從歐氏幾何的其他公理推出。把這些問題提高到理論上來考察，就需要研究在一個公理學系統里，能夠推演出什麼，以及能否導致邏輯矛盾，這兩個



問題是关于公理学方法的主要邏輯問題。

在这个阶段，从佛萊格(1848—1925)和皮亞諾(1858—1932)开始，数理邏輯学家們继承了前一阶段的成就，在研究数学证明的过程中，他們具体地并且有系統地分析了数学里的命題和推理，揭示出为数不少的、为古典形式邏輯所未能包括的命題形式和推理形式。为了表示复杂的形式結構，他們使用了特有的表意的符号語言，这种符号語言在研究数理邏輯的过程中也得到了改善和发展。他們的研究成果，表現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一些公理出发进行邏輯的推演，人們所能遵循的推理形式是不可胜数的。在研究公理系統里可能推演出什么来的时候，我們需要考察某一公理系統的全部推理規則，但是我們不可能将某一系統中的推理形式一一列举，因之就有必要将一类推理形式公理化，使之成为一个有系統的整体。这种公理系統的推演和证明，是根据特定的形式規則，通过对符号的运算而进行的，所以又被称为演算。关于推理形式的公理系統，有命題演算和謂詞演算。命題演算是关于联結項，例如“如果……那么……”，“或”，“并且”，“非”等的邏輯特征的公理系統。謂詞演算是关于量項“一切”“有些”和謂項及关系項的邏輯特征的公理系統。在这个阶段里，命題演算和謂詞演算建立了，它們的重要邏輯特征也得到了有系統的研究和闡明。

一般的邏輯只考虑命題的真和假，多值邏輯除了命題的真假二值以外，还考虑到更多的值，例如，命題的各种程度的概然性。模态邏輯研究命題的模态：必然，可能，不可能

等等。在本阶段的后期，多值邏輯和模态邏輯的研究已被提出，并且取得了初步的結果。

数理邏輯的形式化，在本阶段的最后几年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們現在所熟悉的，用符号的形式表达推理結構的方法，例如：“如果甲那么乙，甲，所以，乙。”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甲”“乙”表示任一命題，叫作命題变項。这是邏輯形式化的初始情况。在邏輯代数、命題演算和謂詞演算里，不仅变項用符号，邏輯概念也用符号表示，在这里，我們可以用“ \subset ”表示类与类之間的包含关系，用“ \rightarrow ”表示大致相当于“如果……那么……”的联結詞，用“ \vdash ”表示断定。数理邏輯使用的是特有的表意符号語言，这种語言的每一个符号都有其确定的意义，而每一概念都被特定的符号所表示。关于符号的語法也是完全确定的。这样的符号語言与其所表达的意义是完全对应的，因之，当意义确定了之后，我們就可以暂时抛开意义，而只从語言符号来考虑某些問題。如果概念与符号之間已經建立了完全的对应，那么，在說到概念之間的邏輯关系的时候，可以只讲符号之間的形式关系。承认前件的假言推理就可以轉換为以下关于符号的規則：

从 $\vdash A \rightarrow B$ 和 $\vdash A$ 兩組符号，可得 $\vdash B$ 。

这样作，当然还是为了处理符号所表示的意义，暂时抛开了意义，决不是不顾意义，而是为了便于思維的进行。这是数理邏輯进一步形式化的結果。

虽然数学的需要推动了数理邏輯的研究，但是，也不能认为推理形式的推广，只是由于数学的需要而产生的，这种說法并不合



乎历史事实。就关系逻辑来说，关系逻辑对于阐明数学概念和数学证明是不可少的，然而关系逻辑的产生并非由于数学的推动，英国逻辑学家和数学家德摩根早在他的关于三段论等等五篇论文(1846—1863)中就提出了关系三段论，这是对于推理的形式结构进行考察和把亚里士多德三段论推广的结果。

从三十年代开始，数理逻辑的发展进入了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数理逻辑的发展是极为迅速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在公理数学方法和有关演绎方法的一般理论方面都得到了重要的结果。同时，也建立了新的数学工具——递归函数论*。数理逻辑的中心问题转向了包括能行思维和能行计算的能行性理论的研究。近十余年来，由于电子数字计算机的发展，结合计算技术的能行性研究，更成为数理逻辑研究的主要趋势。

递归函数论是为了研究数学证明而发展起来的。研究数学证明，需要考虑某一公理系统里可能作的一切证明，而一切可能的证明的数量是无穷的。为了掌握有关无穷的规律，数学归纳法和集合论中关于无穷的一些方法，是有力的工具。把这些方法引用于研究证明，就要求能够在数字与符号之间建立起一一对应。事实上，这也是可能的。例如，根据一定的对应方法和规定，我们可以以1表示 \rightarrow ，以2表示P，以3表示Q，这样， $P \rightarrow Q$ 这个公式就可以用213这个数字来表示了。从这个简单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把命题与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表现为一定的符号公式之间的关系之后，逻辑关系就可以转换成数字的关系，对于逻辑问题的研究，

也就可以转换为一种数学问题的研究了。递归函数论的建立解决了数字与符号之间的对应问题，为研究证明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也是能行性研究的开端。

随着数理逻辑科学的发展，对于能行性的研究提到了日益重要的地位。一般说来，在数学中，如何给一个命题作出证明，是没有固定不移的办法的。证明的给出是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是创造性的活动。但是，有些类的命题的证明却是能行的，能行的方法是，按照确定的方法经过有限的步骤，可以得到相应的结果。就计算而言，加法是能行的，二数相加必然有结果；求最大公约数的方法也是能行的。能行方法意味着问题可以用机械的方式解决，能行方法的获得，对于证明和计算都有重要的意义。上面对于能行性的说明，只是初步的和直观的，为要对能行性作出进一步精确的定义和说明，必须对能行性作具体研究并且能给出能行的方法。歌德尔所发展的递归函数论(1931)，就是一种关于能行性的理论。英国的数理逻辑学家图灵在一九三四年用一个理想机器进一步对能行性作了科学的说明。图灵机器反映了能行性与机器计算的本质联系，也推动了数

- * 递归函数论是一种关于算法的理论。最简单的递归函数可以用一对公式来定义，公式之一给出变数为0时的函数值，另一个公式则给出一个计算方法，确定如何从变数取值 n 时的函数值求得变数取值 $n+1$ 时的函数值。例如 $x!$ 的公式是：(1) $0! = 1$, (2) $(n+1)! = (n+1) \times n!$ 。当变数的值给定后，例如 $4!$ ，我们就可以根据已给出的公式，把对于 $4!$ 的计算，回归为对于 $3!$ 的计算，最后回归为对于 $0!$ 的计算，而 $0!$ 的值是已经给出的。这样，函数值就可以在有限步之内算出。



理邏輯中关于数字计算机的研究。一九五一年，苏联数学家馬尔科夫发表了他的算法論，对于能行性理論作了卓越的貢獻。

四十年代以来，数理邏輯的研究，特别是能行性理論的研究，已經与計算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結合起来，数理邏輯有了新的应用领域。在科学技术上的实际应用，促进了这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以上，我們对数理邏輯发展的主要阶段，作了简单的說明。从数理邏輯的发展来看它和形式邏輯的关系，是很清楚的。数理邏輯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終是以思想方法，是以演繹方法的形式結構为其对象的。数学的推理和证明都是演繹的推理和证明，公理学方法是以演繹法为基础的科学方法，能行的推理过程又是演繹法的一个种类。可以看出，演繹法是联系形式邏輯和数理邏輯的關鍵。

与古典形式邏輯相比較，数理邏輯的对象虽然是演繹法，但是它近年来的成就，無論就深度或广度來說，都在頗大的程度上丰富了演繹法。所以可以說，数理邏輯发展了形式邏輯的演繹法。

数理邏輯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是有其历史的淵源的，也是密切联系了数学思維的結果。从古代起，邏輯学家就感觉到，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論不足以概括当时人們的思維形式。自斯多葛派开始，命題邏輯的新形式不断地有所发现。德摩根等人关系邏輯的提出，更从根本上推广了古典的主宾詞邏輯。到了近代，特别是到了十九世紀末叶，不少邏輯学家和数学家曾分析了大量的数学命題和数学证明。他們广泛地运用了符号語言，研究了一系

列的数学方法，发现了許多新的思維形式，突破了傳統形式邏輯的局限，发展了数理邏輯。

表意的符号語言在数理邏輯的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数理邏輯的許多概念，都是关于形式結構的新的抽象，它們与一般的概念有联系，也有所不同，例如，实质蕴涵 \rightarrow 与普通語言里的“如果……那么……”就有不小的差別，用原有的語詞表达，往往容易发生混淆。在日常語言里，同一語詞在不同种类的句子中可以表示不同的概念，例如，大家所熟知的“是”字，它有时表示相同或相等，有时表示类和分子的关系等等，而在表意符号語言里，不同的概念都用不同的符号来表示，意义是确定的。在日常語言里，同一命題，例如选言命題就有若干不同的表达方式，而在数理邏輯中，却用一种符号来表示。这种語言的符号是清楚紧凑的，公式时常是一目了然的，因而有助于思維的进行，便于运算。很难想像，沒有符号語言，数学科学能够有今日的发展。

就广度而言，数理邏輯不只在数量上提出了一些新的形式，它还研究了古典形式邏輯所不能包括的关系推理。古典形式邏輯把命題都归結为主宾詞形式，忽略了关系命題，也抹煞了关系推理。关系命題和关系推理在思維的各个領域里都很常見，也很重要，它們的存在不容否认，也不能簡單地被归結为主宾詞形式。例如，“甲大于乙，乙大于丙，所以，甲大于丙。”和“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所以，消灭帝国主义即消灭战争的根源。”这两种推理都是牵涉到关系的推理。再就命題來說，例如这样两个命題：

(一)有些溶液可以溶解所有固体。



(二)一切固体都可以被有些溶液溶解。

从前者可以推出后者，从后者却不能推出前者。这种逻辑关系之所以成立，也是必须通过关系命题才能显示出来。关系命题和关系推理在数理逻辑里得到有系统的研究和处理。

数理逻辑突破了古典演绎法的局限，还突出表现在它建立了包括某类推理形式的整体的理论体系，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命题演算包括了与逻辑联结词有关的逻辑规律；当然也有假言推理、选言推理和二难推理。谓词演算包括了与量词以及关系命题有关的逻辑规律，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只是其中一个极小的部分。两个演算都是公理系统，都是从若干公理开始，应用推演规则而证明一系列的定理的演绎系统。它们不只是在应用上被证实为足够的，在理论上也被证明为完全的，它们可以包括属于这范围内的一切逻辑规则和推理的结构。两个演算的建立，使我们有可能把这类推理规则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从而为证明论的研究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同时，也由于有了两个演算，我们现在已经不是零碎的和个别的，而是掌握了一整套的有系统的工具，来从事对于推理和证明的分析。

我们还可以看到，数理逻辑所研究和使用的公理学方法，虽然也是一种演绎方法，却是超过了古典演绎法的范围。一个公理系统都能推演出什么，会不会导出逻辑矛盾，以及在其中能否导出一切有关的定理，是数理逻辑的重要问题。数理逻辑在公理学方法方面所获得的成果，丰富了逻辑学里有关演绎方法和证明的理论。在此需要提出的是所谓不完全性定理。歌德尔在一九三一年证明

了每个包括自然数理论在内的公理系统都是不完全的，其中都包含有这样的命题，它既不能被证明又不能被否定。每一个这样的公理系统都是不完全的，都不可能把它所要反映的客观内容完全概括在内，这说明了公理学方法的局限性，驳倒了那种企图把数学的某一个部门用公理系统一劳永逸地建立起来的错误想法。

凡此种种，可以看出，数理逻辑在命题的种类，推理的结构，推理的体系，公理学方法等方面获得了不少成果，这些成果都丰富了和发展了形式逻辑的演绎法。关于数理逻辑和形式逻辑的关系，我认为就应当这样来理解。

数理逻辑长期以来，为唯心主义者所歪曲。有些唯心主义者把数理逻辑的公式和规则，说成是约定的和先验的。罗素认为：“逻辑命题是不需要考察现实世界而先验地认识到的。”同罗素一样，荷兰的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布劳维也认为，数学中的判断就是所谓先验的综合判断，他们把思维和客观世界相割裂，把数理逻辑神秘化，利用数理逻辑的研究成果为唯心主义观点服务。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它歪曲了数理逻辑这门科学的面貌。这种观点是不利于数理逻辑的发展的，是必须加以批判的。实际上，上面已经提到，数理逻辑这门科学归根到底是适应生产的需要而形成和发展的。我们应当正确地认识数理逻辑的作用，把数理逻辑和唯心主义哲学严格区别开来。我们应当关心和重视这门科学，很好地研究它，使数理逻辑得到应有的发展。



草原上的拓荒者

烏兰巴干

我要到梦布勒克*开荒队里去了解情况。临行前，公社党委书记对我说道：

“这个开荒队刚刚组成，大家的热情很高，只是对搞饲料基地、办农业经验不多。开荒队长斯琴莫日根同志是个好党员，但对领导开荒种地却是个新手。你去了，多给他们提些意见吧。”

我带着十分激动的心情，直奔久别的梦布勒克。一路走着，我的脑海里不禁涌现出那一片漫无边际的荒滩。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荒滩曾经是我们同美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反动派作过战的战场。我记得很清楚，在那方圆百里的荒滩上，有一条战马能跳越得过去的小小泉水，名字就叫梦布勒克。泉水附近有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屯子，几个倒塌的蒙古包和几座破破烂烂的帐篷，像一条即将被狂海吞没的漏船一样，奄奄一息地停在风暴里。为了拯救那里受苦受难的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曾用自己的鲜血保卫过它。现在我又到这里访问创造新生活的人们，心里多么高兴啊！

晚秋的太阳，带着春天的暖意，普照在整个荒滩上，闪烁着一片光芒。荒滩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村庄。银白的蒙古包和金黄色的帐篷

群中间，耸立着瓦蓝蓝、红通通的美丽建筑物。梦布勒克变成了一个方圆几里的大湖，在村旁荡漾。白花花的湖水，像是一只展翅欲飞的大天鹅。从湖里分出来两条小河，清水顺着新开的渠道流向荒滩的

遥远边际。大片新垦的土地，黑油油的摊在渠道两旁，村周围那幽静的远山，红叶稠密的树林，仿佛都朝着灿烂的太阳，发出微笑。

我沉醉地观望着这里的美景，踩着新垦的土地前进，忽然发现，在我右方的荒滩上像是一股巨大的旋风竖起了顶云的尘柱。我停下来，擦擦眼睛朝烟尘看了半晌，才看清楚，烟尘里奔跑着五匹烈马，牵引着一台铁犁。扶犁的是一个苗条身材而又刚健的女开荒队员。她把五匹烈马的皮缰一齐攥在手里头，长杆子皮鞭不断地在马头上甩出脆响，汗水与灰尘混成了泥浆糊满了脸，衣服全被汗水浸透，上面也挂着一层厚厚的土，浅蓝色的长袍子成了土色的布衣，裹头发的方巾，束腰的宽带，全看不出原色。驯服地拉犁前进的五匹烈马，一见我走过来，全惊慌起来，挣着缰绳，其中最高大的一匹黑鬃烈马，疯也似地竖起了前肢，嘶叫着朝天伸长了脖子，一团长长的黑鬃飘舞起来，其余的四匹也都朝四面挣缰。那扶犁的女开荒队员立即被五匹烈马裹在中间。不管引犁的烈马怎样的发疯，她毫不慌乱地弄着缰绳，在马中一斜身子，猛一拉缰，把那跳起来的黑鬃烈马一下子给拉了下来，

* 蒙语，银色的泉眼的意思。



脖子向地下插去，差点儿沒有被她拉倒了。又一股更大的烟尘从地上突起，她和馬全被烟尘籠罩起来了。我的眼前模糊一片，只听她的皮鞭在空中发出脆响，震蕩着四野。

过了一会儿的工夫，馬都被她馴服了，有的把嘴巴子插在地上，作出突突鼻音，有的甩动着头搖摆着尾，原地不移地发出嘶鳴，还有的閃着眼睛盯着那扶犁的女开荒队员。烟尘消散了，扶犁的女开荒队员又熟练地甩了几响鞭子，拋去馬韁，默默地冲我走来。她那严厉的目光向着我，但是，沒有責备的意味。我向她作了自我介紹。她显然很高兴，但不多說什么，只用热烈的握手表示欢迎我。她的手，那和五匹烈馬掙紮的手啊，像是曝日下两块坚实而又火热的石头，紧紧地扣住了我的手。

我忙問道：“同志，你們开荒队长斯琴莫日根同志在嗎？我想見見她！”

扶犁的女开荒队员朝我微笑，不回答。

“啊！那么，你就是斯琴莫日根同志！”我醒悟地說道。

这时我又把她仔細地端詳一遍。她那圓形的臉上，有两只秀丽的大眼睛，像是刚从泉里撈出来的水晶石一般的明亮，头发遮着被太阳晒得紫紅色的前額，她的嘴唇儿，被枯風吹裂了几条細血縫。我忽然发现她的額头正中隱藏着一块刀砍的旧伤痕，这伤痕我多么熟悉呵！我癡呆地盯了一陣子她的臉，又远望着梦布勒克湖水，記憶潮水似地在我的脑子里涌現出来。我記得，那是一九四七年七月。国民党反动派勾結起这里的反动封建王爷搞武装叛乱，闖进梦布勒克荒滩，屠杀牧民，搶掠牲畜。当时，我在解放军某騎兵連当战士，我們接受了攻打进犯梦布勒克

荒滩的敌人的任务，經過一昼夜激战，把团聚在这儿的敌人打退了。清晨战斗结束后，我来到梦布勒克泉旁飲馬，这时，附近村里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朝这边跑来。那小姑娘的正額上受了刀伤，伤口带着血痕。她抱着两件血衣，好像根本沒有发现我似的，一奔到泉边，就蹲下去用泉水洗起她那两件血衣来，血衣立刻把泉水染紅了。我的战馬喝飽了泉水发出嘶号，使那小姑娘吃了一惊。她猛一抬头，才发现了我，就放下了血衣，猛地站起身子，她的眼光射成直綫，落在我的枪杆子上。她一边緩步朝我走，一边把被血衣弄紅了的手，攥着拳头。这时我发现，她那充溢着仇恨血絲儿的眼睛里，沒有泪，好似燃起了火一般的紅。她一接近我的身边，两手抱住了我的一条胳膊，仰面朝天，嘴唇儿抖索了半晌，才說出了一句話：“同志，我求求您，求求您！”

“有什么事情，你說吧！”

“我要参军！”

“参军？”

她放开了我的手，呆呆地望了一会儿泡在泉水里的血衣，慢慢地告訴我，她的一家全是王爷的奴仆，她媽媽沒有儿子，所以把她叫特木尔呼*。父亲是梦布勒克荒滩上的第一个蒙族农民，他一面給王爷放牧，一面暗地里在梦布勒克荒滩上耕营一小块地。昨天敌人来了，掠走了他們的粮食，打死了她的父母，父亲临咽气还在輕輕地叨念着他的土地……特木尔呼說完，她的眼睛又轉向敌人逃跑的方向，遥望着南边。她仿佛向天，向大地，向那寬闊无边的草原，发誓似地說道：

“我恨国民党，恨封建王爷，我要替爹

* 蒙語，铁小子的意思。



媽报仇!”

当时，我激动地听她讲完之后，对她說，她年紀还小，騎兵連还不能收她当战士；还告訴她，我們一定为她报仇。可是，沒等我說完話，她弯腰抱起那两件血衣，疯一般地跑了，我追上去喊叫她，她不应，也不回头看我一眼。

半年后，一个大雪天，我正在离梦布勒克荒滩不远的树林里放哨。忽然，林外傳來了一陣剧烈的枪声，我跑出去一看，只見在草原上疾馳来一匹枣紅馬，馬上沒有人。我奔过去，打算抓住馬，到跟前一看，馬背上搭着一条口袋，还有一个孩子，闭着眼睛，咬着牙关，两手紧攥着馬鬃，吊在馬脖子上。我吃惊地叫了一声，那孩子才松下手，跳在地上。这时我才清楚地看到了她的臉，真是意料之外，原来是特木尔呼。她把小辮子剪去了，把头用半張生羊皮裹起来，她身上沒挂花，用吊脖子乘馬木躲避了敌人的射击。她认出了我，呆視了片刻，轉身把馬背上的口袋拉了下来，里边装着一斗炒米。她把口袋拖到我跟前，猛地攥住我的手，眼含泪說道：

“同志，这是一斗炒米，送給同志們吃吧，粮食是我父亲种的，是我收的，我炒的！”

她說罢，跃身上枣紅馬就馳走了……

荒滩上的那个沉默寡言而又勇敢的小姑娘，給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看着斯琴莫日根額上的刀伤，心里边暗想，莫非她就是特木尔呼？不禁地問：“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她叫特木尔呼。”

不等我說完，斯琴莫日根笑了說：“特木尔呼不在了，她变成了斯琴莫日根。”

我惊喜地攥住了她的手，激动地一句話也說不上来了。

这时候，别处傳來鞭响馬嘶和人們的高喝声。我轉身一看，荒滩上到处散布着开拓的人馬，像是激斗一般地开垦着荒地，整个荒滩烟尘連成了一片，籠罩了一切……

傍晚时，我和垦荒的人們一块儿进了梦布勒克新村。我的心里很急，想不錯过一切机会多跟斯琴莫日根談談情况，就先走进开荒队的食堂。队员們正热热闹闹地吃着白面饅首和燉羊肉，可是，这儿沒有斯琴莫日根同志。我从食堂出来又赶到了队部。队部是一座带有四根柱子的大型蒙古包，里面寬敞，陈設也很利落，除了一张大桌外，还挂着好几面色彩繽紛的錦旗。可是，包里仍不見斯琴莫日根。我来不及細看錦旗，扭身走出蒙古包外，又赶到蒙古包东側大馬圈旁。我在馬圈的北面找到了她。她剛飲完了馬，不知为什么，一个人停在自己的铁犁旁，焦灼的眼睛呆視着自己的铁犁。我叫她一声，她明明听到了我的喊声，仍瞪着她的犁。我順着她的眼光朝铁犁一看，原来那铁犁的鐮子，已經扭成了卷筒，那粗大的铁犁全斜歪了。好久，她才轉过身来对我說道：“同志，里边坐吧！”

我們走进帳篷里。她剛打着了一根火柴点上了灯，帳篷外头，忽然傳来了嗒嗒嗒铁的碰击声，接着从外面闖进来三个青年。他們都是蒙族开荒队员，个个长的身高臂壮，全像摔跤手。他們一进帳篷，就抖拳甩手地冲着斯琴莫日根大吵大嚷：

“队长，我們明天怎么办？”

“明天，按计划开荒呗！”斯琴莫日根說。

“用啥去开？”一个青年焦急地說道。

“犁呢？”

“犁，嘿！你出去看看！”另一个青年指向外头說。



斯琴莫日根朝三个青年的脸上瞥一眼，从床头上掏出一把手电筒打着，走出了帐篷。我也随出去。在斯琴莫日根的手电筒的照射下，瘫着三台全被扭弯了的铁犁，和斯琴莫日根使坏的那台铁犁一样，扭弯的程度不差上下，犂子全扭成了卷筒。

原来，这里仅仅有七台不是开生荒用的破旧铁犁，公社临时从别处调来叫他们试用。他们刚刚抛下镐锹使上犁杖，这一天工夫就坏了四台，明天只能有三台出去垦荒了。斯琴莫日根沉默了一阵，忽然，眼睛闪起光芒，把手高高地举起来，又朝下猛地一劈，坚决地说道：

“什么困难能把人吓倒？犁坏了，我们的双手还好好呢，只要有手，总得把梦布勒克荒滩翻开！”

三个青年人盯着开荒队长的严肃的面孔，终于停下了吵嚷，都不好意思地垂下了头。斯琴莫日根显然在抑制着自己的激动，她亲自倒了三杯水，分别送到三个年轻人的手里，随后，悄悄地解下头巾，又朝他们递了过去，像大姐姐似地说道：“擦擦汗！”

三个年轻人喝水擦汗的工夫，斯琴莫日根说：“过两天旗里就会给我们送来合格的开垦犁，那时候，问题就解决了；可是我们不能坐着等，时间太宝贵了！”她说着，把手一摆，“走，咱们立刻把所有的铁锹、大镐都集中起来，修理修理！”

这一天我们没有谈成。次日我起来的最早，又去找斯琴莫日根。来到她的帐篷一看，她已经率领那批开荒队员，抛下了坏犁，扛起铁锹开荒去了。我走出帐篷，朝着被开垦着的荒地走去，当我登上一道土坎，不禁地被一场不平凡的景象吸引住了。我看到斯琴

莫日根同志，正带领着一群队员们抡镐舞锹地翻地，那带着杂草的泥土，在他们脚下翻起了黑色的波浪。昨天晚上，斯琴莫日根的那句话又响在我的耳边：“我们不能坐着等，时间太宝贵了！”

不久，旗里给他们送来了十五台开垦犁，开荒的速度突飞猛进，没过一个星期，大片的新垦地接连地出现在梦布勒克荒滩上。

塞外的寒冷来得很早，晚秋还未过，就下起雪来。正当开荒队和严寒、僵冻争夺时间开展斗争的时候，我离开了开荒队。临行的头一天晚上，我去斯琴莫日根的帐篷与她道别。

斯琴莫日根正坐在灯下起草着来年播种计划。我们谈了些别的话，她忽然高兴地说：“朋斯克拉喜同志回来就好了！”

朋斯克拉喜是斯琴莫日根的丈夫，我想，这是女同志盼望丈夫回来的一般想法。她立刻又对我说，她丈夫是学开拖拉机的。原来，她是在盼望丈夫回来把他们的开荒队机械化，快些用上拖拉机开荒……

“你明年春天再来看看吧，我们要用麦苗装饰起荒滩的新面貌，我们要让它长出金子一样的麦粒，再堆成一座金山！”最后，她握着我的手，这样满怀信心地邀请我。

.....

冬天过去了，春风吹开了大地。在春播前，旗里分配给梦布勒克开荒队三台马拉播种机，领导上派我送给他们。我把播种机拆开分别驮在几峰骆驼上，就出发了。真凑巧，在途中遇到了斯琴莫日根同志，她也拉了十多峰骆驼。公社分配他们开荒队几千斤小麦种，她亲自来公社用骆驼驮回去。我们两队骆驼合成了一队，日夜兼程地向前走着。不料想，在一个夜晚，我们正通过一条宽阔的河槽的



时候，遭到了春洪的袭击。我和斯琴莫日根刚把骆驼拉到河槽中的一个土陵上，冰水涌满了河槽，土陵立刻成了汪洋中的孤岛了。

驮着八个袋子麦种的四峰骆驼一下子落进水里去了。登上土陵的斯琴莫日根不顾一切地跳进水里去牵骆驼，一块半间房子那么大的厚冰排从上流压下来，立刻把她压进水底。我惊慌地叫她一声，刚要跳水去抢救她，只见她猛地一挺身子从冰排底下挣脱出来，向我命令似地叫道：“你看住骆驼，不要下来！”

我停下来，焦急地看着她。在黄昏的余晖照得一楞一楞发黑的洪水中，她翻滚着个儿，游进水的深处，抓到了那落水骆驼的缰绳，她终于将四峰骆驼牵上了河岸。不想，最后登岸的那峰弄断了绑袋绳，一口袋麦种脱下来，还不等落水她就用肩顶住了。一口袋麦种驮在她肩上留在水里头了，她拚力地想把麦口袋扛上土坎，在水里朝土坎走了两步，就不能走了。水下冲来的黄泥，紧紧地裹住了她的脚。我不顾斯琴莫日根的劝阻，也进了水，想去抢救她和麦种。我入水没走几步，还没接触到她，也陷进水底泥里去了。我们两个人相隔十来步远面对面地在水里挣扎了许久，无法脱水上岸。而且，脚越陷越深，到后来连动都动不得了。

刚消化的春洪，冰凉入骨，似乎浑身的血液全凝成了冰。浮在水面的冰块，环绕着我们旋转，夜风掀起了波涛，水浪也朝我们扑打起来。这时我见斯琴莫日根抬起头，拚力地把自己从冰得麻木的状态里唤醒，睁大了眼睛，展望起满天的星斗。那天上的银河，那明亮的星斗，全闪动着火一样的光辉，仿佛在向她说话，就是和你们一样地落在水里，我们也永远闪光！

斯琴莫日根似乎牙齿咬着嘴唇，仿佛扛着麦种口袋的双肩，从冰里升出了热力，把着口袋的双手，慢慢地攥起了铁拳，这时候，她的眼光异常的冷静，她好似用眼睛向我说：“种子，种子，党和祖国多么需要它，人民多么需要它，我们一定要保住它，把它栽培在我们新垦的荒地上呀！”

这时斯琴莫日根在我眼光里，像是寒冷中的热光，冰里的火把，高高地竖立在我的面前……。

夜幕拉开了，星辰沉入了黎明的光辉里，大地终于托出了红色的太阳，洪水退下去了。

早晨，我们赶到了梦布勒克，迎接我们的是斯琴莫日根的丈夫朋斯克拉喜同志。他前几天把一架“东方红”牌拖拉机开到这儿。

这天我睡到过午起来，来看斯琴莫日根，不知她经过这场斗争，身体怎么样。可是包里只有她的孩子。孩子们说，妈妈早起来了，到湖边去了。我又来到湖边，老远就看见斯琴莫日根正蹲在湖边上，用湖水洗着她那抢救麦种时被洪水陷泥弄脏的衣服。

我长久地停在她的身后，望着她的背影，不禁想起在解放战争的年月里，这个湖还是小泉眼时的那些情景。她不正是当年满含血泪洗着父母血衣的小姑娘特木尔呼吗？然而，在今天却是在洗着为祖国增粮而弄脏了的战衣；她不正是曾送给我们一斗炒米的小小女奴吗？然而，在今天却是在征服荒滩、为祖国增粮而战的共产党员。清清的湖水，在她的手下荡漾着，春天正在她的身边伸开巨大的翅膀降临到这里，眼前那一片清静的湖水，映照



着美丽的万里长空。

